秦漢的律令學

——兼論曹魏律博士的出現

邢　義　田

壹、引　言
貳、秦代的律令學
　一、中央集權政制與律令學的興起
　二、以吏爲師——律令傳習的主要形式
　三、小　結
參、漢代的律令學
　一、律令學的背景
　　(1)刑德相養——黃老與儒家對律令刑法的看法
　　(2)霸、王道雜之——皇帝對律令刑法的看法
　　(3)明習律令——仕宦的一個條件
　二、律令傳習的特色
　　(1)以吏爲師
　　(2)以律令爲家學
　　(3)以兼習經、律爲風尚
肆、律令學的沒落與曹魏以降律博士的出現
伍、結　語
　附　註
　引用書目

壹、引　言

法令是秦、漢行政的重要依據。漢代人說：「吏道以法令爲師」（1），又說：「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2）。據漢簡所見，漢代公文習慣以「如律令」作結（3），而漢吏考課很重要的一項標準在於是否「頗知律令」（4）。漢吏治事既以法律爲據，漢

註1　漢書補注（以下簡稱漢書），卷八十三，薛宣傳。
註2　漢書，卷八十三，朱博傳。關於漢代律令簡是否爲三尺問題，詳見注208。
註3　參注16。
註4　參勞貞一，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三十八葉，771條；三十九葉，790條；八十三葉，1682條；一三七葉，2830條；一五七葉，3239條；五〇五葉，7930條；五八三葉，9717條等。陳直以爲漢代功令「頗知律令」一句，乃沿襲秦代功令而來。參氏著，史記新證，頁24。

制又淵源於秦，秦、漢官吏是如何「頗知律令」的呢？這對瞭解秦、漢政治的運作不能不說是一個要緊的問題。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曾請焚書，並議「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5）。秦代官吏如何以吏爲師？過去，由於史料缺乏，大家無從多論。近來自從雲夢秦簡出土，不但增加了我們對秦律本身的認識，對秦代「學法令以吏爲師」一事也有了較多的瞭解。

學法令以吏爲師，不單是秦代如此，漢代亦同。過去大家討論漢代的教育或學術，多半限於經學而不及律令。的確，漢人重經，教育也以儒經爲主。不過，漢儒兼習律令的風氣很盛，和漢代以後千百年裏的學風大不相同。只談經學，不言律令，似不足以窺漢代學風的特色。漢儒兼習經、律的風氣和漢代兼以經、律爲據的政治密不可分。東漢以後，政治貴族化，風氣亦漸變。及乎漢季，風氣從兼重經、律轉爲重經而卑律。最後曹魏不得不立律博士，以傳授律令。律博士的設立，意義匪淺。它打破了漢武帝以來，唯以五經得爲博士的壟斷局面。秦、漢律令傳習的情形如何？律博士爲何至曹魏而出現？漢代既然兼重經、律，爲何有五經博士而無律博士？斯篇之作，擬就這些問題作一討論。首先略述嬴秦的律令學，繼言兩漢律令的傳授，以明漢儒兼修經、律的風尚與轉變，終則試爲曹魏以降律博士之所以出現進一解。

律令學是相對於經學而言。經學以儒經爲對象，言人道，天道與治國理民的大經大脈。律令學則以行政中龐雜的法令規章爲對象，以知如何處理行政實務爲主。秦政任法，專以法令爲尚；漢政則在法令以外，又以經義爲據，所謂：「法聖人，從經、律」（6）。漢代經學，言者甚多；而秦漢政治一貫依據的律令，則似少人論及。拙文所說律令之學的「律令」是一個泛稱。秦漢律令有法、律、令、科、比等類的不同。本文暫不擬疏解這些類別的性質和差異，只擬指出秦、漢的官吏透過什麼樣的途徑，習得他們必要知道的法令依據。當然，官吏因職位高低和職務性質的差異，須要知道法令規章的多少和性質不盡相同。由於材料的限制，我們無法細說什麼樣的職務，必要知道什麼樣的法令，又如何去學習它們。我們只能籠統言之，見其大較。舉例來

註5　史記會注考證（以下簡稱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又卷八十七，李斯列傳文小異，作「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無「法令」二字。

註6　後漢書集解（以下簡稱後漢書），卷四十四，張敏傳。又孔光對上所問，則「據經、法」（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可參。

說，雲夢秦簡的主人只是秦南郡安陸地方的一個小吏，曾掌治獄，位不過史、令史(7)。但是他墓中律簡的名目多達三十一種，內容十分廣泛(8)。這位小吏是如何習知這些律令呢？再如漢律。漢律內容極爲龐雜。有因循秦代舊律改作者，如蕭何的九章律、叔孫通所訂儀法以及傍章十八篇(9)。又有明法之臣隨需要修改增添的，如景帝時，鼂錯更定有關諸侯王法令三十章(10)；武帝時，張湯作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作朝律六篇(11)。漢書刑法志謂：

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

漢初劉邦的三章約法到武帝時已增加爲三百五十九章。因爲不可能事事立法，其無律文可循者，則依判例，比類決之，於是又有決事比。決事比數量驚人，僅關死罪，即已上萬，致令典者不能徧睹。武帝以後，各朝被迫屢屢刪修律令(12)。除此以外，還有皇帝不斷因事下達的詔令。詔令因作用和對象，分爲策書、制書、詔書、誡勅或戒書(13)。漢書賈山傳謂：「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詔令既下，官吏將它們編排起來，作爲施政的依據。在新近發現的居延簡中，有成帝時期的「詔書輯錄」殘册，收有文、武、元帝的詔書摘要；還有王莽「詔書輯錄」殘

註7　參睡虎地秦墓竹簡，「編年記」，頁6～7。

註8　睡虎地秦墓所出律文名目小計如下：田律、廄苑律(廄律)、倉律、金布律、關市、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軍爵律、傳食律、行書、內史雜、尉雜、屬邦、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勞律、公車司馬獵律、牛羊課、傅律、捕盜律、戍律、臧律、敦表律、魏戶律、魏奔命律，共三十一種。參睡虎地秦墓竹簡。

註9　漢書卷四十三，叔孫通傳；貢書卷三十，刑法志。

註10　漢書卷四十九，鼂錯傳。

註11　貢書卷三十，刑法志。

註12　西漢宣帝、元帝、成帝皆曾詔刪修律令，參漢書卷二十二，刑法志。東漢桓譚、陳寵、梁統曾議刪修律令，不及行。安帝時，謁者劉珍、博士良史讎校漢法令於東觀。建安時，應劭刪定律令爲漢儀，獻之。參後漢書，桓譚、陳寵、梁統、蔡倫及應劭各傳。

註13　漢官解詁：「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勅」(漢官六種，頁86)；蔡邕，獨斷以爲漢天子命令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

册，輯有始建國、天鳳和居攝年間的詔書(14)。這些都構成漢代律令的內容，也是官吏須要學習的對象。

約而言之，我們所說律令之學的律令包括皇帝的詔令、朝臣議訂經皇帝認可的制度儀法、治獄的刑罰律條、規程、判例、甚至公文程式等等。這些東西漢人常泛稱爲法令、法度、律令、法律、文法或單稱爲法或律(15)。其中應用最普遍的一個名詞是律令。漢代行政文書通常以「如律令」作結尾。風俗通義說：「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16)。因此，拙文姑以「律令」代稱秦漢行政遵循的一切法令規章。有關這些法令規章的學習和傳授也就是律令之學。

漢代承秦餘緒，頗重治獄。獄吏每成律家，位至公卿。他們言律令，傳徒衆，即常以治獄爲主（詳後）。因此，下文所及不免偏於治獄，但也將兼及其他。我們希望能從較廣濶的角度，討論在一個以律令爲依據的政治裏，官吏如何得知他們必要的律令知識。

註14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册文物」，頁8。

註15　漢人對法律通名並沒有嚴格一致的用法，例如漢武帝說：「法令者，先帝所造也」（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杜周以爲「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漢書卷六十，杜周傳）；應劭又認爲「律者，法也。皋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以九章，此關諸百王不易之道也。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于令甲』」（風俗通義佚文）；元帝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典文者不能分明」（漢書卷二十三，刑法志），是以法令爲律令。又桓譚上疏曰：「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後漢書卷二十八上，桓譚傳），是法令、法律、法度又可通。餘不備舉。

註16　風俗通義校注，「佚文」，頁584。「如律令」一詞已見於雲夢秦律，參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倉律：「咸陽十萬一積，其出入禾，增積如律令」，頁36。又散見於漢代簡册遺文。新近發現的居延簡册如「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爰書」都可見以「如律令」爲公文結尾。前者參初仕賓，「居延簡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頁179～184；後者參「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釋文」，頁30～31。因「如律令」爲公文常用語，漢代民間用於地下之地券，鎭墓文竟亦倣用之。參陳槃庵，漢晉遺簡識小七種，頁21，「如律令」條；又氏著，「於歷史與民俗之間看所謂『瘞錢』與『地券』」，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中册，頁861；鎭墓文以「如律令」、「急急如律令」作結幾爲通例，例如：寶鷄市博物館，「寶鷄市鏟車廠漢墓一兼談M1出土的行楷體朱書陶瓶」，頁48；王光永，「寶鷄市漢墓發現光和與永元年間朱書陶器」，頁55；河南省博物館，「靈寶張灣漢墓」，頁79～80；吳榮曾，「鎭墓文中所見到的東漢道巫關係」，頁56～57；武威漢簡，頁149。

貳、秦代的律令學

一、中央集權政制與律令學的興起

以刑治民，淵源甚早。傳說夏、商兩代都曾作刑(17)。刑制如何卻不易確考。兩周以降，資料漸豐亦較可徵信。西周大約已有成文的刑法。左傳昭公七年提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杜注：荒，大也；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又文公十八年，周公作誓命，言及九刑。叔向也說：「周有亂政，而作九刑」(18)。「九」可以言「多」。九刑是不是如逸周書嘗麥篇所說爲九篇刑書，難以徵考(19)。不過，西周有成文的刑書似不成問題。尙書呂刑篇說：「明啓刑書胥占」。呂刑一般相信成於西周(20)。其中當然也可能摻雜有較晚的成分，例如「五刑之屬三千」這樣詳密的罰則，就很難確定是西周時的制度。

從西周到春秋初期，像呂刑所說墨、劓、剕、宮、大辟之類刑罰的方法或許已經俱備。但是刑書的內容還不致太詳密，大約只是列舉若干類的處罰而已。至於何罪何罰，罰之輕重，似可由掌刑者原情定罪，「輕重諸罰有權」(21)。刑罰還不詳密，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的發展尙不及春秋中期以後那麼複雜，不需要太繁複的條文；另一方面也因爲封建未潰，時政所依，多在禮制。左傳說，「禮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

註17 竹書紀年謂帝舜「命咎陶作刑」；左傳昭公十四年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又左傳昭公六年，叔向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傳說中夏代以及夏代以前的刑罰，只是一些用刑的方式。例如尙書堯典所說的五刑：墨、劓、剕、宮、大辟。還有「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的鞭、扑、贖金也是處罰的方式。堯典成書於戰國初（屈翼鵬，尙書釋義，頁2），其中有多少是三代以前舊制？又有多少後人附會？難以確斷。殷商刑制也尙難知。文獻、卜辭俱不足詳徵。陳邦懷在殷代社會史料徵存一書中曾有意據卜辭勾稽殷代法律的程序，但是他對卜辭定義的認定不無疑義。參 Kwang-Chih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PP. 200~201。陳夢家卜辭綜述於殷代刑法無考。

註18 左傳昭公六年。

註19 逸周書卷六，嘗麥：「太史筴刑書九篇」。孔廣森集訓校釋謂：「刑書九篇蓋卽春秋傳之九刑。」又安井衡左傳輯釋，昭六年引惠棟云：「九刑謂刑書九篇也」（卷九，頁246）。九作「多」字解，見汪中述學，「釋三、九」。

註20 經生舊解以爲作於周穆王。傅斯年先生以爲乃呂王所作，陳槃庵先生和之。不論是周穆王或呂王，其作於西周應可採信。參屈翼鵬，尙書釋義，頁136~137；陳槃庵，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增訂本）第五冊，頁422ab。

註21 尙書正義，卷十九，呂刑，頁138。

並」(22)；又說：「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23)。然而，封建禮制終因周室不振，漸失作用，紛爭的列國隨著時代的變動，逐漸偏向以新形式的刑書和刑鼎爲治民之具。

春秋、戰國以來，在列國政治中央集權化的過程中，頒行成文法典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據左傳，早在楚文王之世（689～677B.C.），楚國已有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24)。據管子法法篇，管子曾主張公布法令(25)。這是不是齊桓公時代的事，我們不敢說。所知較爲清楚的例子是鄭國子產於魯昭公六年（536B.C.）鑄刑書(26)。二十三年以後（514B.C.），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27)。到了魯定公九年（502B.C.），鄭國駟歂殺鄧析，用其竹刑(28)。鄭、晉鑄刑曾引起叔向、孔子和蔡史墨等人的批評和反對。左傳曾將他們的議論鄭重其事的記載下來。我們先看看有關的記載，再討論鄭、晉鑄刑書的意義，左傳昭公六年：

>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肹聞

註22　左傳昭公十九年。
註23　左傳昭公五年。
註24　左傳昭公七年。
註25　管子卷六，法法第十六。又卷一，立政第四「首憲」言布令之法。
註26　左傳昭公六年。
註27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註28　左傳定公九年。

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從叔向和孔子等人的批評可以看出，鄭、晉鑄刑書和刑鼎有類似的時代意義。第一，刑書或刑鼎的鑄造意味著以刑法取代傳統的禮制。所謂「棄禮」、「失其度」，都是指放棄過去維繫「貴賤不愆」的禮制。所謂「擅作刑器，以爲國法」，「鑄刑書，將以靖民」，又都指刑法將成爲治政理民的依據。從禮而法，顯示了春秋中期以後，列國政治轉變的一個趨向。封建秩序解體，生存競爭下的列國爲建立更有效的統治，紛紛走上中央集權的道路。集權君主或權卿憑依的就是法令辟禁。所謂「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29)。孔子說：「道之以政（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政謂法教」；朱熹注：「政謂法制禁令也」），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30)。他的話，就是對當時從禮而法的政治發出的感嘆。

第二、鄭、晉鑄刑是兩國一連串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的一環，而不是孤立的事件。叔向已經提到子產鑄刑書以前，「作封洫，立謗政」。所謂作封洫是指魯襄公三十年，子產使「田有封洫，廬井有伍」(31)的經濟、社會改革。他又不主張毀鄉校，使百姓得「以議執政之善否」(32)。魯昭公四年（538B.C.），子產更「作丘賦」。杜

註29 韓非子卷五，飾邪。
註30 四書集注，論語卷一，爲政，頁7；論語注疏，卷二，爲政，頁5。
註31 左傳襄公三十年。
註32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注：「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33)。子產整頓田洫，編組百姓，增加賦稅，進而頒訂刑書，都是他所說「吾以救世也」的一連串行動。晉國的變革也很類似。晉國早在魯僖公十三年（645B.C.），「作爰田」、「作州兵」(34)。魯文公六年（621B.C.），范宣子「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35)。從這一段記事看來，晉國最少在范宣子時代已有行諸晉國的「常法」。爲什麼一百多年以後，還要將他的常法鑄成刑鼎呢？

這就牽扯到鄭、晉鑄刑的第三點意義：以明文的法律條文治民，不再如叔向所說是「議事以制」。所謂「議事以制」，杜預注：「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36)。又安井衡左傳輯釋引王引之云：「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37)。王、杜所說不豫設法，度事輕重以定罪，正是前引呂刑所說「輕重諸罰有權」。舊制雖有刑書，有常法，但是似乎並不是將某罪某罰詳詳細細的規定出來，而是讓執法者有相當大的彈性，決定罪罰的輕重。這樣的作用，據孔穎達疏，是「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也」(38)。

註33　左傳昭公四年。杜注根據司馬法：「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而來。關於鄭國的「丘賦」以及下文所說晉國「爰田」、「州兵」的意義，可參高亨，「周代地租制度考」，文史述林，頁. 146～155。

註34　左傳僖公十五年。

註35　左傳文公六年。

註36　安井衡，左傳輯釋，卷十九，頁13 a。

註37　同上，頁13 b。

註38　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十三：「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也。今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己，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柄移於法，故民皆不畏上」。執法者可以有較大的彈性，定罪輕重，似乎更容易造成叔向所說的「亂獄滋豐，賄賂並行」。這可以從晉國鑄范宣子刑書以前的兩件獄訟賄賂案子看出來。一件發生在魯昭公十四年（528B.C.）。據左傳，晉國邢侯與雍氏爭田，晉國的理官士景伯到楚國去，由叔魚代理其職。韓宣子命他斷獄，他認爲錯在雍子。雍子於是將女兒嫁給叔魚。叔魚竟改判邢侯理虧。邢侯大怒，將叔魚和雍子殺死。宣子問叔向應如何判邢侯的罪。叔向說：「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曰昏；貪以敗官曰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於是宣子乃殺邢侯，並將叔魚和雍子的屍首暴於市場。

另一件發生晉鑄刑鼎的前一年。據左傳，前一年秋天，魏獻子爲執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羊舌氏之田爲三縣。治理各縣的大夫都由他委派，晉國中央集權的政治因而向前邁進了一步。該年冬天，新置的梗陽縣民發生訴訟，梗陽大夫無從斷案，只好將案子上報魏獻子。梗陽打官司的一方就來賄賂魏獻子，以女樂相贈。魏獻子本來打算收下，卻因屬下大夫的勸諫而謝絕了。從梗陽人行賄和魏獻子有意接受，以及前一案叔魚可因賄顛倒曲直看來，未鑄刑鼎以前的晉國刑獄，是非曲直似無定則。又叔向論三人之罪，根據的並不是范宣子的刑書，而竟是一部舊籍夏書。可見在舊制之下，貴族如叔魚、叔向之流，於刑罰獄案，頗可以輕重由己。鑄造刑鼎，依明文議罪，一方面有助於保障平民權益，另一方面可以約束貴族賄賂公行，顛倒獄訟的情形。平民與貴族勢力的消長，以及中央集權制的加强皆於此可見。

叔向和孔子擔心刑罰一旦明文鑄出，掌法者將盡失議罪的彈性，不能再加輕重，而百姓將「徵於書」，所謂「民在鼎矣」。

其次，過去雖有刑書常法，行於全國，但刑典卻藏在京師，由專人掌典。例如，逸周書嘗麥篇就提到周的刑書由太史「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管子立政篇也說：「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又戰國策，魏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注：憲，法令也〕。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安陵君所述雖爲戰國初事，但憲令藏於大府，卻是舊制。根據這些文獻看來，刑典不論由太史、司徒或其他的執政掌管，似皆藏於所謂的盟府、太府（大府）。知道刑法憲令內容的是受憲的官吏，一般老百姓對刑典的確切條目恐不甚了了(39)。鄭、晉鑄刑書，使刑書的內容流佈，一般百姓於是得悉條文。這是民徵於書，民在鼎矣的另一意義。否則，則無所謂「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和子產可能同時的鄧析，又作竹刑。以竹刑爲名，大約因書之於竹簡。竹簡較鼎大爲輕便，傳抄也容易。據說鄭國百姓紛紛從鄧析「學訟」(40)。這些都是刑書流佈民間才能有的現象。鄧析的竹刑不但輕便，內容或許也更爲週致細密(41)。因此，駟歂殺鄧析，卻要用他的竹刑。總之，鄭、晉鑄刑，反映兩國封建禮制沒落而新秩序有待建立。新秩序不再是封建下領主與領民的關係，而是以明文法令約束執政與齊民的關係爲特色。換言之，建立新秩序的需要促使兩國走上明文法治的道路。

大約在鄭、晉鑄刑書的前後，列國也陸續走上了明文法治的道路。可惜史料有

註39 周禮卷卅四，司寇刑官之屬，「大司寇」條：「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另周禮卷卅五，「小司寇」條、「士師」條、卷卅六，「布憲」條都提到懸示法禁憲令的事。周禮所述或有所本，然更近於戰國以降，法家諸子所鼓吹的公佈法令的思想。春秋時代雖已有平民教育，然眞能識字之一般庶人恐極有限。即使憲令公佈，其條目似亦非一般小民所能確切瞭解。春秋中晚期以後，平民教育漸發達，民智漸開，平民的權益不再是貴族可以任意輕重，公佈成文刑書乃成必要與有意義的舉動。

註40 呂氏春秋，卷十八，審應覽第六，「離謂」，頁8b～9a。

註41 錢賓四，先秦諸子繫年，「鄧析考」，頁19。

闕，我們無法作更多的舉證。最少在戰國之初，魏文侯（445～396B.C.）的宰相李悝已有機會參考「諸國法」，撰著法經一書。晉書刑法志說他「撰次諸國法」(42)，唐律疏義說他「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43)。可見他的法經並非憑空揑造，而是就各國刑典，加以整理比較。去蕪存菁的結果，應較諸國法完美，不言可喻。原在魏國任官，又喜刑名的衞鞅，將這樣一部法典帶到秦國，使秦變爲一個法治的强國。約略在同一時期，齊國的威王有騶忌幫助他「脩法律而督姦吏」(44)；韓國的昭侯則有申不害爲他規劃「因能授官」、「循名責實」、「任法不任智」(45)的强國之道。總之，最遲到戰國初期，列國君主訂定的法令辟禁已經成爲治政理民最重要的依據。馬王堆所出古佚書經法篇說：「人主者…號令之所出也」(46)；韓非子則說：「主上有令」，「官府有法」；「令者，言最貴者也」(47)，「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48)。法令辟禁既爲治民的依據，官吏就不能不學習。前引管子立政篇和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都提到地方官吏如何集於京師，學習憲令。雲夢秦簡裏一份由郡守發給縣、道嗇夫的訓示，明明白白地說，良吏和惡吏的一大區別是在能否「明法律令」(49)。律令之學因而興焉。

律令之學和法家之學本來都是隨著春秋戰國尙法之治的出現而興起。先秦法家言帝王之術。所論以帝王掌政治國的權術爲主。談到刑賞，主要也在討論如何以刑賞爲手段，達到統治的目的。律令學則以治獄理訟之實務爲主，與法家所論有層次之別。但是法家言形（刑）名和刑獄實務似不無關係。當執法者依刑法條文治罪，刑條名目

註42　晉書卷三十，刑法志。

註43　唐律疏義，卷一，「名例」，頁8。今本李悝法經雜有晚出的名詞用語，必非原來面目。但晉書和唐律疏義說李悝曾造法經一事，應有所本，非向壁虛構。

註44　史記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註45　韓非子卷十一，外儲說左上；太平御覽卷六十三引申子。

註46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釋文」，頁33。

註47　韓非子卷十七，問辯。

註48　韓非子卷十六，難四。

註49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19～20：

凡良吏明法律令，事無不能殿（也）；有（又）廉絜（潔）敦慤而好佐上；以一曹事不足獨治殿（也），故有公心；有（又）能自端殿（也），而惡與人辨治，是以不爭書。惡吏不明法律令，不智（知）事，不廉絜（潔），毋（無）以佐上…。

如何切合罪狀之實，以得其平，實爲大問題(50)。這個問題卽名實之辨，也就是形名之學，所謂「刑名者，以名責實」(51)。莊子天道篇謂：「驟而語形名賞罰」，是形名與賞罰相連，形名辨而後賞罰中。雲夢秦簡「法律答問」有很大一部分卽在界定律文裏用字措辭的確切含義(52)。這是依律用刑不能不分辨的。將這種名實的分辨歸納爲「循名責實」的原則，擴大運用到對整個官僚組織的任用和考核，也就成爲法家學問的一大成分(53)。因此，漢書藝文志以爲法家出於理官，不是沒有相當的道理。法家之學如何超脫實務的層次，已無法詳細尋索其軌跡。概括言之，我們所知的先秦法家，都在指導國君，施法治，力集權，行富强，以求稱霸天下。等到秦、漢一統，許多法家揭櫫的原則，如因能授官，循名責實，依法而治，號令出一都已具體實現在大一統的政府中。先秦法家的歷史任務，於焉完成(54)。秦漢一統以後，雖仍有以申、韓之學爲名者，究其實多言律令治獄而已（詳後）。因爲帝國的統治繼續戰國遺規，依法令而治；帝國的官吏不能不習法，也就不得不有律令之學。

二、以吏爲師—律令傳習的主要形式

爲吏須習律令，欲習律令則以吏爲師。以吏爲師並不是李斯的發明。商君書和韓非子已言之在先。韓非子說：「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55)。這話看起來似乎在陳述一種理想，實際上只是肯定已經存在的事實。最少從戰國之初，法令成爲治政的依據以後，學習法令就是以吏爲師的(56)。商鞅「

註50 子產鑄刑書，鄧析難之的故事，似卽反映了名實的問題。子產刑書初頒，或尙非周密。鄧析大可鑽條文漏洞，「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呂氏春秋卷十八離謂）。漢書藝文志以託名鄧析之鄧析二篇入名家，卽可見鄧析所爲的性質。

註51 漢書卷九元帝紀師古注引劉向別錄。

註52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149～243。

註53 H. G. Creel,「The Fa-Chia: Legalists or Administrators?」，頁607～636。

註54 法家思想與秦漢行政組織的關係，蕭公權論之甚精。參Kung-chuan Hsiao, "Legalism and Autocracy in Traditional China"，頁108～122。

註55 韓非子卷十九，五蠹。

註56 以吏爲師的傳統淵源久遠，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史釋」云：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頁152）

陳槃庵亦認爲以吏爲師是「古代中國一向的傳統」。參氏著，「春秋時代的教育」，頁748。

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57)。中庶子爲私臣性質。商鞅「事」魏相，一方面是爲魏相服務，一方面也是跟魏相學。此禮記，曲禮上所謂「宦學事師」者也。商鞅好刑名，隨公叔痤學，公叔痤因「知其賢」，而想薦舉他。這應該是以吏爲師的一個例子。秦國據說有掌管法令的官吏，負責教人法令。商君書說：「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58)。這一段出自定分篇。定分篇非商鞅手著，但成篇不遲於秦統一天下以前。因爲雲夢秦簡的主人翁喜，死於秦始皇三十年。從他的經歷以及墓中竹簡的性質看，喜就是一位司法，還可能兼教法的吏。作者過去曾經推測喜職務的性質(59)。現在擬就前旨，再作些討論。

根據墓中所出的編年記，墓主喜曾任史、令史，並曾擔任「治獄」的工作。墓中陪葬的一千餘枚竹簡，大部分是秦國的法律文書。這些簡顯然和墓主生前的工作有關。其中「爲吏之道」簡應是一份教材。它教人如何作吏，說明什麼是吏的五善，什麼是吏的五失。文中有很多「戒之戒之」、「謹之謹之」、「愼之愼之」教誨人的語句。這部分竹簡書寫的方式也和其他簡篇不同。其文句分上下五欄抄寫，而最下一欄爲韻文。例如：「凡戾人，表以身，民將望表以戾眞，表若不正，民心將移乃難親(60)」。文字用韻，便於記憶。秦漢字書教本如蒼頡篇、急就篇都用韻，其理相同(61)。從這些地方看來，這篇東西可能是用來訓練地方官吏的。還有一份原題爲「南郡守騰文書」，後改題爲「語書」的簡編。這是南郡郡守在秦王政二十年發給轄下縣、道嗇夫的一份文件。這份文件並未提到什麼特定的事故，主要在宣揚法治，說明良吏和惡吏的區別。或許這是以一份實際的行政文書爲教材，而「爲吏之道」則是特別編寫的教本。這些教材在墓中出現，說明些什麼呢？

這有兩個可能：或者說明墓主是一位司法兼教法的吏，或者說明這些是墓主自己受訓時所用的教本。何者爲是？現在不易確斷。不論如何，這都不妨碍我們據以瞭解

註57　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

註58　商君書第二十六，定分。

註59　拙著，「雲夢秦簡簡介——附：對『爲吏之道』及墓主喜職務性質的臆測」，頁33～39。

註60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291。

註61　秦漢字書用韻，從新近發現的阜陽漢簡蒼頡篇可以看的很清楚。參胡平生、韓自强，「蒼頡篇的初步研究」，頁37～39。

秦代以吏爲師的實況。據前引商君書定分篇，秦置法官和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師。如果「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者，則輒使學議法令所謂，爲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爲法令以罪之。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62)。這段文字的大意是：從吏學法有一定的進程，不中程就會受罰。教授的法令不得增損；增損一字以上就會招來殺身之禍。這是一段記載秦代法吏訓練難得的材料。

又根據秦簡，學法令者的身分或爲「弟子」；學習的地方或稱之爲「學室」。秦簡「除弟子律」謂：

> 當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審，皆耐爲侯〔候〕。使其弟子贏律，及治〔笞〕之，貲一甲；決革，二甲(63)。

秦墓竹簡的注釋者認爲這是「關於任用弟子的法律。按秦以吏爲師，本條是關於吏的弟子的規定」(64)。這個說法是可以接受的。古來師有弟子，弟子有名籍曰弟子籍，淮南子道應篇：「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秦律裏的弟子籍應是同類的東西。弟子不但隨師學習，也要供師使役，服侍業師。根據論語的記載，樊遲、冉有和子路都曾爲孔子駕過車(65)。鄉黨篇描述孔子的私生活，則爲弟子服侍左右所見的記錄。弟子服侍業師最詳細的記載見於管子，弟子職。弟子職有人認爲可能是齊國稷下學宮的學則(66)。學則中對弟子一天從早到晚，如何侍候先生起牀、進食、就寢、打掃屋室等都有詳細的描寫：

>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維遹按：「拚」卽「𠂤」之或體字，說文「𠂤，掃除也」〕盥漱，汎拚正席〔王筠云：汎拚者，灑掃也〕，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洪亮吉云：古者每食必祭，斂祭者，斂攝所祭，不使人

註62 商君書第二十六，定分。
註63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131。
註64 同上。
註65 分見論語，爲政、子路和微子篇。
註66 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管子集校，頁956。

得踐履，所以廣敬」，先生有命，弟子乃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昏將舉火，執燭隅坐…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洙若按：「儀」當爲「義」〕，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67)。

從這裏看來，弟子服侍業師，有如僕奴。或許因爲有些老師過度役使弟子，秦律竟對役使弟子有所規定。如果使喚弟子超過法律的規定，又笞打弟子，要罰一甲；打破了皮，就要罰兩甲。老師還不可以不當地開除弟子，或對弟子作不當的保舉。如有不當，將被耐爲候。秦代弟子不但有相當的保障，可能還享有徭役上的特權。秦律：「縣毋敢包卒爲弟子；尉貲二甲，免；令，二甲」(68)。縣令和縣尉不可以將兵卒包藏爲弟子，以逃避兵役。如果這樣，縣令要罰二甲，縣尉除了罰二甲，還會丟官。漢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復其身(69)。文翁於蜀置學官，有學官弟子，「爲除更繇」(70)。看來漢代弟子除復之制，或卽淵源於秦。

弟子學習的場所或稱之爲學室。秦律「內史雜」有一條說：

令敓史毋從事官府。非史子殿（也），毋敢學學室，犯令者有罪(71)。

學室大概類似學校，但不是一般的學校，因只有史之子才能入學。古代職業尙世襲，所謂「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72)，「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73)。學室只有史之子才可入學，似與這個傳統有關。當然秦代爲吏不一定皆是史之子，學習的地點也不一定全爲學室。叔孫通爲秦博士，有弟子百餘人，他們的身分背景如何，如何隨叔孫通學習，可惜都難以知道了。

作吏第一步須先能識字，卽學書(74)。說文序引漢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75)」。第二步才習計算和律令文書。漢吏功令裏每將

註67　同上，頁956～972；又載望校，嘗子卷十九，弟子職第五十九，頁26～27。
註68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131。
註69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傳。
註70　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
註71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106～107。
註72　國語卷六，齊語。
註73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註74　勞貞一，「史記項羽本紀中學書和學劍的解釋」，頁499～510。
註75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十五上，頁11b。

「能書、會計、頗知律令」三事連爲一體(76)。這些是作吏的基本條件。秦代吏的養成有學室，學室所授或許就是這些東西。

提到學室的秦律是「內史雜律」的一條。漢書百官公卿表謂：「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77)。學室屬京師內史所轄，是不是意味京師才有學室呢？或是郡、縣皆有學室？這個問題一時還無法確實回答。不過，從前引「縣毋敢包卒爲弟子」一條看來，縣有弟子，卽可能有學室。這種制度在漢初並無踪跡可尋。漢代學校，從中央太學以至地方學官，凡平民之俊秀皆可入學，與秦之學室不同。

雲夢秦墓裏「法律答問」簡的性質也有必要在這裏作些檢討。我們懷疑這是墓主向「主法之吏」問法的記錄。秦有所謂主法之吏，商君書定分篇說：「聖人爲法…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同篇還說：

> 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皆以吏民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卽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卽復有物故，以券書從事。

這一段說的很清楚，主法令的吏必須回答官吏與百姓的詢問，並將答問作成記錄。記錄像符一樣有左券、右券。左券交給詢問者，右券由主法吏保存。符長一尺六寸。雲夢竹簡「法律答問」的部分長約二十二至二十三公分，相當於秦尺一尺左右，與定分篇所說並不相合。又定分篇說「明書年月日時」、「封以法令之長印」。現在所見的竹簡，出土時已散亂，不見封印，也不見日期注記。因此，我們並不能肯定「法律答問」簡就是定分篇所說的左券或右券。不過定分篇所述可能是某一時期的定制，實際上不可能全無出入。例如前引同篇所說「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我們很難想像這樣的規定可以完全實行。根據定分篇，我們相信秦代確有將法律答問作成記錄的制度，而今所見的「法律答問」簡應該就是這類東西。另一個旁證是法律答問的形式和用語，在漢代還有遺迹可尋，而漢代的法律答問就產生在法律諮詢的場合。漢書卷

註76　參注4。

註77　有關秦內史的研究，可參于豪亮，「雲夢秦簡所見職官述略」，頁5～7。

五十六，董仲舒傳謂：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謂大議，這裏是指大的疑獄，故由掌獄的廷尉出面請教。仲舒通經，亦擅律令。漢書循吏傳說他「通於世務，明習文法」，故「其對皆有明法」。這樣的諮詢不知有多少，但據說董仲舒編輯起來的有二百三十二事，也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載的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這十六篇已佚，只有數條尚存(78)。這幾條形式皆同，僅舉一例，以概其餘：

> 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79)。

董仲舒治獄記錄(1)採取答問，(2)以甲、乙擬設案情的形式(3)以及「何論」的用語，和秦簡「法律答問」的習慣可以說完全相同。所不同者，不過是他以春秋斷獄，引用經義而已。如果我們確定「法律答問」簡是法律諮詢的記錄，接著不禁要問：這些簡是墓主詢問主法之吏的結果？還是他本人就是主法之吏，備他人諮詢而藏有這些簡？這個問題當然無法十分肯定的回答。不過，我們以爲以前者的可能性爲大。「法律答問」簡的內容十分零碎，並無系統，不像是主法之吏藏有的記錄，而像是墓主隨治獄需要，有疑義則隨問隨記的結果。其次，如果墓主是主法之吏，大概也不能將這樣的記錄陪葬。前引商君書，定分篇說的很清楚，如果主法之吏「有物故，以券書從事。」這些答問的券書還要留著用，當然也就不能拿來陪葬。無論如何，這都爲秦代「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的實況提供了消息。

秦代以吏爲師的例子見於記載的很少。史記賈誼傳提到孝文帝時，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掌刑獄，可見吳公明習刑獄。他從李斯所學也應是治獄律令之事。這可以算是一個以吏爲師的例子。秦

註78　董仲舒春秋斷獄有玉函山房輯本一卷，共輯七條。其中兩條明言董仲舒；另四條明引董仲舒春秋決獄，蓋確爲董氏之作。另有一條但稱公羊說，未明言董仲舒，果否爲決獄之文，無它可證。參沈寄簃，漢律摭遺，卷廿二，頁4a～6b。

註79　沈寄簃，漢律摭遺，卷廿二，頁4a。

二世胡亥從中車府令趙高習「獄律令法事」(80)，也是以吏爲師。或許以吏爲師只是當時很普通的事，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否則就很難有機會在史籍中留下記錄。

總之，秦代學法令，以吏爲師，並不始於李斯的建議。這是一個相沿已久的習慣。那麼，他爲什麼還要特別提出來呢？主要的原因是戰國以來，諸子並興，各逞異說以取合諸侯。諸子無論刑名、儒、墨，皆有弟子。弟子隨師仕宦，吏道爲之駁雜。按照法家的看法，法令是國家唯一的標準，也是官吏唯一應該學習和遵照的東西。愼子說：「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81)。李斯根據同一理路，認爲「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82)。這是不能不改革的事。李斯之議在始皇三十四年，雲夢墓主喜死於始皇三十年。其墓中竹簡充分反映了李斯建議以前，思想上黑白不別，一尊未定的情況。「爲吏之道」簡編充滿儒、道兩家思想的色彩(83)，而「日書」一類的竹簡又言日忌吉凶，五行相剋。這些在李斯看來都是虛言亂實，道古害今，應該禁止的東西。這些簡出現在秦國小吏的墓中，不論它們是墓主教人或受訓的教材，都說明了李斯奏議的背景。於是他强調天下統一，應該以吏爲師，而所應習唯有法令辟禁而已。

三、小　結

綜上所述，先秦法家與律令之學都是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經濟變動和集權官僚政治形成過程中的產物。集權官僚制是繼封建制崩潰而起的新的政治形式，其目的在建立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秩序的維繫不再依賴封建宗法傳統，而是公開明文的法律。法律的對象不再是封建領民，而是國君與官僚治下的編戶齊民。先秦法家是新秩序的說明和辯護者。他們也從經驗中歸納出治國理民的原則，指導集權官僚政治進一步的發展。律令之學則是法治運作中的實務之學，以理訟治獄爲主要內容。依法令治民的新官僚不能不曉習律令辟禁，而曉習的途徑則在以吏爲師。「以吏爲師」之制淵源久遠，並不始於李斯的建議。秦統一天下以前，從吏學法的梗概，可據雲夢秦

註80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註81　愼子逸文，太平御覽卷六三八引。
註82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註83　拙著，前引文，頁34～35。

簡和商君書，依稀得之。大體而言，秦代吏的子弟有機會入學室爲弟子，從吏學書，學算，學律令文書。學習有教本，有進程，不中程有罰則。弟子以吏爲師，師並不能任意役使弟子或加笞打。由於弟子是國家未來的公務員，他們或許還享有某些徭役上的特權。秦代可能還有所謂主法令之吏。一般人有法律疑義可以向他們請教。主法吏必須回答，也必須作成記錄，這可以說是一般人的「以吏爲師」。如果我們相信「爲吏之道」是一種教材，其中儒道的思想適反映了李斯議焚書以前，思想未定於一尊的情況。李斯主張「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的用意，卽在企圖化律令辟禁爲士人唯一可以學習的東西。他的主張雖然沒有完全成功，但是在漢代政治中卻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叁、漢代的律令學

一、漢代律令學的背景

(1)刑德相養——黃老與儒家對律令刑法的看法

秦漢大一統政治組織的建立，可以說是封建舊制解體以後，戰國中央集權官僚政制更進一步的發展。這種新制的發展，不能歸因於某一人或某一派的政治學說。不過，以申、商、韓非爲代表的法家，無疑應居於主導的地位。新制的精神在於肯定君主是統治權力唯一的來源，君主的旨意以詔令法律爲形式，透過分層專責的官僚，下及於編戶齊民，所謂：「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84)。理論上，法是一切政治運作的依據。擁護這種制度最力的是法家。李斯以一法家的後勁，參與秦帝國的創建，使許多法家的主張都落實在現實的國家機器之中。

這樣的一部機器一旦建立，依法而治的原則卽難以動搖。我們看到戰國末期，當以法治爲核心的集權官僚制逐漸成熟的時候，不論是道家或儒家都不能不放棄反法的傳統，紛紛在自己的思想系統中爲法安排一個適當的位子。這樣作的，荀子是儒家主要的代表，而馬王堆墓所出伊尹・九主以及老子卷前古佚書，則可爲道家的代表。儒、法和道、法之間的調和是戰國末到漢代，政治思想發展上一個主要的特色。單純的申、韓之學在進入漢初以後，雖然沒有戛然而止，但的確是逐漸沒落了。漢初治

註84　管子卷十五，任法第四十五。

申、商、韓非的有賈誼、鼂錯、韓安國等人。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衞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85)。可見到武帝初，法家之學仍傳而不絕。然而，其學被扣上「亂國政」的罪名，世變之亟，也就可見。漢代人常將申、韓之政化約爲嚴刑峻法的代名詞，並且與嚴酷的秦政相提並論。他們反秦酷政，連帶也就反對申、商、韓非。董仲舒說：「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86)；鹽鐵論謂：「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87)；劉向說：「秦孝公欲用衞鞅之言，更爲嚴刑峻法」(88)。申、韓在漢人眼中，直如蛇蠍。揚雄以爲「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89)。故劉陶作反韓非(90)，王充論衡有非韓篇(91)，馮衍作賦，更欲「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92)！在這樣的空氣下，終兩漢竟少有從正面論述申、韓之學的(93)。若干號稱好「申、韓法」、「韓非之術」或「申、韓之學」的，如樊曄、周紆、陽球，不過是一羣「刻削少恩」、「〔爲〕政嚴猛」、「專任刑法」、「嚴苛過理」的酷吏罷了(94)。

漢人有鑑於秦政，諱言申、韓，但並不反對刑名法術。申、韓之說因頗託於黃、老而繼續存在。漢初黃老之學盛行，黃指黃帝，老指老子。黃老皆言帝王治術。馬王堆所出黃老帛書卽大談刑名法術。帛書經法篇謂：「法度者，政之至也」(95)，「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爲符」(96)；稱篇謂：「案法而治則不亂」(97)；

註85 漢書卷六，武帝紀。

註86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

註87 鹽鐵論校注，卷二，非鞅第七，頁51。

註88 新序，卷九。

註89 法言，卷三，頁3b。

註90 後漢書卷五十七，劉陶傳。

註91 論衡卷十，非韓篇，頁1a～10b。

註92 後漢書卷二十八下，馮衍傳。

註93 漢書藝文志列法家十家，其中可確知爲漢代著作的僅鼂錯三十一篇。清侯康撰補後漢書藝文志卷四，法家類僅有崔寔政論六卷和劉陶的反韓非。顧櫰三撰補後漢書藝文志收錄較廣，其卷八「諸子類」中亦不見漢代有關申、韓之作。

註94 後漢書卷七十七，酷吏傳。

註95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釋文」，頁31。

註96 同上，頁35。

註97 同上，頁40。

又主張「循名究理」(98)、「審名察形」(99)。稱篇以爲法治最高的境界在於「大〔太〕上無刑」(100)；十大經篇則說：「事恆自施〔施〕，是我無爲」(101)。在這一點上，帛書所言是與老子合轍的。伊尹・九主說：「主分：以無職並聽有職，主分也」，「得道之君，邦出乎一道，制命在主」，「故法君爲官，求人，弗自求也」，「佐者無扁〔遍〕職，有分守也」，「故法君之邦若無人，非無人也，皆居亓〔其〕職也」(102)。這些話也反映出濃厚法道合流的色彩。漢初君臣好黃老，究其實乃好有法術刑名之實，而無申韓之名的東西。史記外戚世家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前引帛書出自漢初侯王之墓，實非偶然(103)。司馬遷說：「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104)，應劭則說：「文帝本修黃老之言」(105)。黃老與刑名一表一裏的關係，於此可見。而太史公史記將老子與申、韓合傳也就不難理解。大體而言，漢初黃老和武帝以後的儒術類似，常常只是法術刑名政治的緣飾而已。

漢初黃老兼攝法家治術，繼黃老而興的儒學又如何看待法治呢？概略地說，漢儒大多繼續荀子的態度，不再像孔子那樣反對刑法。他們雖然主張以禮樂教化爲主，但是承認刑法與禮樂各有作用，可以相輔相成，都是治國必要的工具。荀子說：

> 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
>
> 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故爲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
> 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愼罰，國家既治四海平(106)。

註98　同上，頁35。

註99　同上，頁40。

註100　同上，頁41。

註101　同上，頁40。

註102　凌襄，「試論馬堆漢墓帛書≪伊尹・九主≫」，頁21～27。關於漢初黃老與法家結合的內涵與意義，參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收入歷史與思想，頁10～20。

註103　前引帛書出自馬王堆三號墓。對三號墓主身分，學者間意見並不一致，但毫無疑問是漢初的列侯或諸侯王。參傅舉有，「關于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墓主問題」，頁165～172。

註104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傳。

註105　風俗通義校注卷二，正失，頁96。

註106　荀子集解，卷下，頁72，74，84。

荀子視禮義法度皆爲聖人所生，又都是天下善治的工具。這個看法和秦、漢時期的儒者是一貫的。成書於戰國末至漢初的禮記說：

> 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107)。

大戴禮記也說：

> 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故御數百年而不懈惰(108)。

禮記、大戴禮記與荀子所說義蘊一致。又漢初賈誼對禮、法功用的認識很可以代表漢儒的通見。他說：

>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109)。

賈誼的話爲太史公引用，也全見於大戴禮記(110)。大抵而言，在漢儒眼中，刑法只有禁於已然之後的消極作用。不過用於維持社會秩序，刑法和有防範於未然之效的禮樂教化，皆有其用，缺一不可。淮南子說：「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法之生也，以輔仁義」(111)。劉向則說：「教化所持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112)；「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幷湊，强國先其刑而后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后者也(113)」。東漢白虎通繼續同樣的觀點，謂：「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

註107 禮記正義，卷卅七，樂記。
註108 大戴禮記卷八，盛德六十六，頁14a～b。
註109 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
註110 大戴禮記卷二，禮察第四十六，頁1b～2a；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
註111 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
註112 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
註113 說苑，卷七，政理。

也」(114)。以上都是從治術一層，承認刑法有輔助禮樂德治的作用。

漢儒更從較高的思想層次上，肯定刑法的地位。董仲舒以陰陽比附刑德，認爲「陽爲德，陰爲刑」(115)。雖然他傾向德治，以爲「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116)。但是在他「獨陰不生，獨陽不生」(117)的思想結構裏，陰陽實相輔相成，刑德也就相互爲用，不可或缺。以陰陽比附刑德不始於董仲舒，也不僅他一人這樣說。馬王堆所出漢初帛書十大經已經將刑德與陰陽比附：

> 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繆〔穆〕繆〔穆〕天刑，非德必頃〔傾〕。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章(118)。

以刑德與陰陽、四時等並稱，更可以推到秦漢以前(119)。可是董仲舒在漢代爲「儒者宗」。他的說法有絕大的勢力，也確立了刑法在漢儒政治思想體系中的地位。

(2)霸、王道雜之——皇帝對律令刑法的看法

漢儒肯定刑法，漢代的皇帝也多重刑名法律。漢初君臣如劉邦、蕭何本皆秦吏。在秦代尙法治的環境下，他們所認識的治民工具就是刑法律令。劉邦入關中，第一件事卽在除秦苛法，更與父老約法三章；蕭何則取「丞相御史律令圖書」(120)。帝國甫建，蕭何又忙著據摭秦法，作律九章。因爲他們除了知道依律令而治，並沒有其他的途徑可以因循。文、景尙黃老，好刑名，已如前述。文帝甚至請了一位治刑名之學的張歐侍太子(121)。其後景帝「不任儒者」不是沒有緣故的。武帝尊儒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從武帝任用張湯、桑弘羊諸人爲輔弼，出董仲舒爲江都相等事看來，武帝實際上是陽儒而陰法(122)。武帝以後，宣帝亦以尙法著名。漢書蕭望之傳謂：

註114 白虎通德論，卷八，五刑。
註115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
註116 春秋繁露卷十一，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註117 同上，卷十五，順命第七十。
註118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釋文」，頁37～38。
註119 關於刑德問題見於先秦古籍以及漢代讖緯書者，參陳槃庵，「古讖緯書錄解題」，尙書刑德放條，頁109～113。
註120 史記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
註121 漢書卷四十六，張歐傳。
註122 參漢書五十八，公孫弘傳，兒寬傳；卷五十九，張湯傳。

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蕭望之嘗薦明於經學的匡衡和張禹，宣帝皆不用(123)。王吉批評宣帝任法不任儒，宣帝不納。王吉掛冠病免(124)。蓋寬饒斥責宣帝時的政治是「聖道湮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125)。宣帝好法卑儒，莫明於與太子之間的一段對話：

>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126)。

宣帝不喜好儒的太子，因其出於糟糠之妻，不忍廢。太子遂卽帝位爲元帝。元帝以後，儒生逐漸抬頭。但是漢政尙法已成堅定不移的傳統。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其中有三章與治獄訴訟有關，通篇於經書大義，反無一語及之(127)。成帝時，儒者仍然以爲時政偏於用法。劉向說成帝曰：「敎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128)。成帝本人除了好詩書，「尤善漢家法度故事」(129)。由於成帝看重律令，因立「好文辭法律」的定陶王爲太子，也就是後來的哀帝(130)。當時的皇帝不但好法律，當時的人甚至認爲「人君不可不學律令」(131)。

註123 漢書卷八十一，匡衡、張禹傳。

註124 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

註125 漢書卷七十七，蓋寬饒傳。

註126 漢書卷九，元帝紀；另參卷八十，宣元六王傳：「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

註127 急就篇在第二十六章提到孝經、春秋、尙書、禮經之名，但於經義一無涉及。急就篇內容所反映對治獄刑律的重視，可參沈元，「急就篇研究」，頁65～66。

註128 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

註129 風俗通義校注，卷二，正失，頁93。

註130 漢書卷十一，哀帝紀。

註131 法言，卷九，「先知」，頁10a。

可見西漢自高祖以迄哀帝，雖然漸重儒術，大體上天子仍重法律，而成一個霸、王道雜之的局面。霸道用律，王道用經。經義與律令乃構成漢代政治的兩大準據。

東京以降，於此不能稍改。和帝時，尚書張敏奏言：

伏見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132)。

順帝時，胡廣上疏謂：

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133)。

從張敏和胡廣的言論可以知道兩漢治道兼雜王霸的精神是一貫的。不過從胡廣所說「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張敏所說「從經、律」，置「經」於「律」之前，和宣帝所說漢家制度「以霸、王道雜之」，置「霸道」於「王道」之前，即可看出漢代君臣對德禮、律令的主輔先後意見似乎並不是全然一致的。

(3)明習律令——仕宦的一個條件

然而兩漢君臣，不論在思想上尚黃老或崇儒術，大致都肯定律令刑罰是治民必要的手段；在現實政治中，經術與律令亦一體並用。如此，官吏除了明經，也不能不明律令。

漢有官有吏。吏更分文、武。文吏主治獄賦役，武吏職在禁姦捕盜。漢書朱博傳謂：「博本武吏，不更文法」(134)，似武吏可不通文法律令。實則武吏捕盜禁姦，如何能不知法令辟禁？或不如文吏專精罷了。朱博能以武吏遷爲職典決疑的廷尉，就證明他並不是眞的不更文法(135)。又從漢代殘留的功令簡看來，漢代邊塞武吏身分的隧長、候長，幾乎沒有不是「頗知律令」的。茲舉居延簡兩條爲例(136)：

□□候長公乘蓬士長富中勞三歲六月五日，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武，年卅七，長七尺六寸。(562.2,圖版38葉)

肩水候官並山隧長公乘司馬成中勞二歲八月十四日，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

註132 後漢書卷四十四，張敏傳。
註133 後漢書卷四十四，胡廣傳。
註134 漢書卷八十三，朱博傳。
註135 同上。
註136 勞貞一，居延漢簡，考釋之部。

律令，武，年卅二歲，長七尺五寸，觻得成漢里家去官六百里。（13.7，圖版39葉）

這裏一位候長，一位隧長，功令註明他們是武吏，然皆「頗知律令」。吏而不知律令，大概不太可能。熟悉不熟悉，專精不專精則容有差別。班固在漢書百官公卿表末尾，曾提到西漢某時「吏員自佐史至丞相」的總人數是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我們今天已經無法估計這十二萬吏員中有多少官，多少吏。但是我們相信官只是金字塔尖端的少數，絕大部分乃是所謂的刀筆吏。對絕大多數的刀筆吏而言，「頗知律令」恐怕比「通明經學」更爲實際和重要。

吏須通文法，官也要曉習法令。兩漢擇官，「明曉法令」一直是一個主要的條件。據衞宏漢舊儀，武帝元狩六年，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這四科是：

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貞白；

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

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

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劇〕令(137)。

應劭漢官儀載光武中興甲寅詔書：「丞相故事，四科取士」(138)云云，其四科與武帝時之四科相同，故曰故事。光武重申以四科取士，可知後漢承西京之制，仍然以「明曉法令」爲任官的條件之一。這四科之中，頭兩科關乎學行；第四科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實則也非據法律以決斷不可，因此四科實爲兩類：一爲學行，一爲律令。兩者相較，明習律令更爲基本。漢吏考核只問是否「頗知律令」，不問是否頗通經術，卽爲明證。

在一個依律令法制運作的官僚組織裏，任何職位都必然有不少相關的法令規章。要擔任這些職位就不能不熟悉它們。這是就一般職位而言。還有一些職位，由於職務的性質，漢代更明文規定須由明律令者出任：

1.治書侍御史　續漢書百官志：「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本注曰：掌選明法

註137 漢官六種，漢舊儀卷上，頁5b。

註138 漢官六種，漢官儀卷上，頁4a～b。

律者爲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

2.廷尉正　漢舊儀卷上：「刺史舉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各一人，詔選諫大夫、議郎、博士、諸侯王傅、僕射、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明律令」。

3.廷尉監　同上。

4.廷尉平　同上。

5.尚符璽郎中　續漢書百官志：「尚符璽郎中四人。本注曰：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王先謙補注引漢官云：「當得明法律郎」。

6.雒陽市市長、丞　漢官：「雒陽市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補」。

須以明律令者出補的職位必遠多於以上所舉。前引丞相設四科取士，其三科明曉法令，卽用以補「四辭八奏」(139)。廷尉是兩漢掌平獄的最高機構。廷尉正、監、平皆爲屬官。以明法出任這些職位的實例如：張湯爲廷尉時，「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140)；黃霸「少學律令…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141)；何比干「經明行修，兼通法律」，「武帝時爲廷尉正」(142)；丙吉「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143)；陳球以「明法律，拜廷尉正」(144)；郭旻治「律小杜…數遷敬陵園令、廷尉左平、治書侍御史」(145)；陳咸「以明律令爲侍御史」、「延尉監」(146)。

除了上述可考，以明法除補的職位以外，還有很多職位也非精於律令者不足擔當。今以實例，略舉如下：

1.廷尉　廷尉一職例由精通法律者任之，如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147)」；于

註139 漢官六種，漢舊儀卷上，頁5b。

註140 漢書卷五十八，兒寬傳。

註141 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

註142 後漢書卷四十三，何敞傳及注引何氏家傳。

註143 漢書卷七十四，丙吉傳。

註144 後漢書卷五十六，陳球傳，王先謙集解引謝承書。

註145 「丹陽太守郭旻碑」，全後漢文卷九十九，頁6a～b。

註146 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寵傳，王先謙集解，惠棟引謝承書及東觀記。

註147 漢書卷五十，汲黯傳。

定國「少學法于父」，「爲獄吏、郡決曹、補廷尉史…超爲廷尉」(148)。成帝時何壽爲廷尉。何壽蓋出於明法之家，其父卽前引何比干(149)。廷尉出於明法之家，在東漢似已成傳統。例如郭躬自父郭弘始，世傳小杜律。後漢書卷四十六，其傳謂：「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吳雄明法律，「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150)。又陳寵曾祖父陳咸於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遭王莽之世，壁藏律令文書於家，遂成家學。其孫陳躬於建武初爲廷尉左監。躬生寵，寵「明習家業」，於永元六年，代郭躬爲廷尉。寵子忠亦以「明習法律，遷廷尉正、尚書、尚書令」(151)。靈帝時，楊賜「自以代非法家」(152)，固辭廷尉。所謂法家，卽傳律世家。可見東漢人以爲廷尉應由世明律令者出任。

2.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御史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舊儀卷上：「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後御史職與丞相參。增吏員凡三百四十一人，分爲吏、少史屬，亦從同秩補，率取文法吏」，「廷尉正、監、平物故，以御史高第補之」；又續漢書百官志：「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從前引可知御史大夫及屬官所職，與法令關係密切。武帝一朝，丞相備員，御史大夫權傾一時，任御史大夫者，如韓安國、張歐、公孫弘、張湯、杜周、桑弘平皆深明律令之輩。以「明法令，爲御史」的有鄭寶(153)；「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者，如薛宣(154)；又前廷尉條引郭躬家世明法，子孫爲侍御史者甚衆。

3.丞相　丞相常由明律令的御史大夫轉遷，如公孫弘、薛宣、翟方進。丞相要明

註148 漢書卷七十一，于定國傳。
註149 漢書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
註150 後漢書卷四十六，郭躬傳。
註151 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寵傳。
註152 後漢書卷五十四，楊賜傳。
註153 漢書卷七十七，鄭崇傳。
註154 漢書卷八十三，薛宣傳。

律令，亦須知經術。公孫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155)；薛宣「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156)；翟方進「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爲通明相」(157)；陳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爲任職相」(158)。

4.尚書、中書　武帝以後，丞相權漸奪，尚書、中書因皇帝親信而日漸重要。尚書、中書之選每在熟嫻法令制度。宣帝時以弘恭爲中書令，卽因「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159)。楊雄法言卷六：「或曰…使子草律。曰：吾不如弘恭」。可見弘恭時以精通律令聞名。成帝時，孔光爲尚書令，須先明習漢制法令而後可：「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尚書…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160)。東漢以後，尚書權更重，所謂「雖置三公，事歸臺閣」(161)。章帝時，韋彪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付，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162)。可見尚書之選多因明法。永初中，陳忠因「明習法律」，從廷尉正遷拜尚書(163)；建武時，郭賀以「能明法」，累官至尚書令(164)。

從以上所舉，可見兩漢職官任用，從最高的丞相、御史大夫到掌握實權的尚書、中書令以及與刑獄有關的廷尉及其屬官，都常以明習律令爲條件。當然兩漢也有很多擔任這些職位，卻不一定俱備明律條件的。例如，東漢末，應劭就曾經批評：「頃者，廷尉多牆面，而苟充玆位；治書侍御史，不復平議讞當糾紛，豈一事哉」(165)。應劭的

註155 漢書卷五十八，公孫弘傳。
註156 漢書卷八十三，薛宣傳。
註157 漢書卷八十四，翟方進傳。
註158 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寵傳。
註159 漢書卷九十三，佞幸傳。
註160 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
註161 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傳，另參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忠傳：「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已來，其漸久矣」。又後漢書卷六十三，李固傳：「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天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實之所歸」。
註162 後漢書卷二十六，韋彪傳。
註163 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忠傳。
註164 後漢書卷二十六，蔡茂傳。
註165 風俗通義校注，佚文，頁586。

批評意味著不通律令而任廷尉和治書侍御史是不正常的現象。

總結以上，漢代爲吏須知律令，爲官須明經，也要曉律。如果只通經而不明律，則是宣帝所說不通世務，「不達時宜」的「俗儒」！因此，不論爲官爲吏，學習律令都是一件重要的事。

二、律令傳習的特色

漢人學習和傳授律令的資料極爲殘闕零碎。這可能是因爲律令傳習是太基本而平常的事，除非有特別之處，一般傳記竟都略而不提。以下勉爲勾稽，可得而言者，殆有三點：一曰以吏爲師；二曰以律令爲家學；三曰以經、律兼修爲尚。

(1) 以吏爲師

漢人學法令，繼續長遠以來的傳統，仍然以「以吏爲師」爲主要的方式。漢初是否像秦一樣有學室和弟子之制，不可考。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裏曾認爲，漢代學僮諷籀書九千字，就是能背誦尉律之文和發揮尉律的意思。他說：

> 諷籀書九千字者，諷謂能背誦尉律之文；籀書謂能取尉律之義，推演發揮而繕寫至九千字之多。諷若今小試之默經，籀書若今試士之時藝(166)。

如果段說可取，則似乎漢代學僮在爲史或爲吏以前，卽能背誦律文，還能推演發揮其義。段氏這樣說，主要是因爲誤解了許愼說文敍。說文敍云：

> 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大史並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167)。

又漢書藝文志謂：

> 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藝文志所說「亦著其法」的「法」應該和說文敍引用的尉律是同一件事。根據這兩段文獻，我們實不能證明漢代學僮始試，諷誦的就是尉律之文。從六體或八體試之看來，考試的關鍵在是否能識和能書寫九千個字。賈誼新書謂：「胡以孝弟循順爲善，

註16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十五上，頁 12a。

註167 同上，頁11～13a。

書而爲吏耳」(168)。漢書路溫舒傳：

> 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

路溫舒截蒲爲牒，稍善書寫，卽可爲吏。爲吏而後學律令。從新書「書而爲吏」和路溫舒的例子可知，試吏在能書識字，恐非背誦尉律之文。路溫舒這樣辛苦學書，因家貧，實不得已。否則，漢代有所謂「閭里書師」(169)，可從學識字書寫，能書而後爲吏。漢書，王尊傳說王尊「少孤，歸諸父…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又漢書，貢禹傳：「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這裏說的情形相同。所謂「史書」是指小史或小吏所用的書體和書法(170)。學會了卽可爲吏。

不過，從急就篇看，漢代的識字教本裏的確包含了初步的律令治獄知識。學僮一面識字，一面也對刑名司法有了起碼的認識。急就篇第二十八章至三十章謂：

> 皐陶造獄法律存，誅罰詐僞劾罪人，廷尉正監承古先，總領煩亂決疑文，變鬥殺傷捕伍鄰，亭長游徼共雜診，盜賊繫囚榜笞臀，朋黨謀敗相引牽，欺誣詰狀還返眞，坐生患害不足憐，辭窮情得具獄堅，藉受證驗記問年，閭里鄉縣趣辟論，鬼薪白粲鉗鈦髡，不肯謹愼自令然，輸屬詔作谿谷山，笞箠起居課後先，斬伐材木砍株根，犯禍事危置對曹，謾訑首匿愁勿聊，縛束脫漏亡命流，攻擊刼奪檻車膠，嗇夫假佐扶致牢，疥痟保辜啼呼嗥，乏興猥逮詗謾求，聊覺沒入檄報留，受賕枉法忿怒仇(171)。

漢代學僮從這短短三章可以大略知道，在中央與地方由那些人擔當治獄，審理些什麼罪行，辦案間供如何進行，刑罰的種類名目，以及罪犯的處置。新近在安徽阜陽發現的漢初蒼頡篇殘簡也有「殺捕獄問諒」（C041）的殘文(172)。據推測，這些殘簡是以秦本蒼頡篇爲底本的抄本(173)。換言之，從秦以來試吏，是以能書識字爲基本條

註168 新書卷三，時變，頁45b。
註169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
註170 富谷至，「史書考」，頁45～50。
註171 王應麟校，急就篇，卷一，頁9a～b。
註172 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蒼頡篇」，頁27。
註173 胡平生，韓自强，「蒼頡篇的初步研究」；頁35～40。

件。但學僮從學字的教本中，已能得到第一步的律令知識。這樣當然是不够的。這些「書而爲吏」的，誠如勞貞一先生所說，只是學徒性質，還須要跟隨在職的官吏，學習法令的內容以及其它作吏應該知道的東西(174)。律令關係實務，實習極爲重要。要實習，則以吏爲師可以說是最好的方式。漢代政府組織下，絕大部分的基層員吏可能都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漢代以吏爲師的例子，現在所能知道的很少。賈誼從吳公可爲一例。史記卷八十四，賈生列傳謂：

>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

前文曾提到吳公嘗從李斯學，得爲廷尉。他擅長的當爲刑獄律令。他召賈誼置門下，就是收了一位隨侍左右的學徒，情形應類似公叔痤和衞鞅。弟子學習一段時間以後，可由師傅推薦爲官；公叔痤因薦衞鞅，吳公因薦賈誼(175)。賈誼爲博士以後，「每詔會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176)。賈誼原習詩書百家之言，卻能議答詔令，更定律令，這應該是從吳公當學徒的結果。鼂錯習申商刑名，又從伏生受尚書。後漢書卷四十三，何敞傳謂其六世祖何比干「學尚書於鼂錯」，李賢注引何氏家傳：「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爲汝陰縣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177)。從何比干兼通法律觀

註174 勞貞一，「史記項羽本紀中學書和學劍的解釋」，頁902～903。

註175 師薦弟子由來已久。論語中例證甚多。例如公冶長篇，「子使漆雕開仕」；雍也篇：「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先進篇：「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殺父與君，亦不從也』」。史記卷九十九，叔孫通傳載叔孫通降漢，有弟子百餘人相從。叔孫通不薦弟子而爲弟子所怨。可見業師推薦弟子爲官是當時的習慣，也是相當悠久的傳統。

註176 史記卷八十四，賈生列傳。

註177 後漢書卷四十三，何敞傳。

之，他從鼂錯所學，除尙書似還兼及律令治獄。鼂錯習尙書以後，歷任太子舍人、門大夫、博士、中大夫、內史、御史大夫。何比干跟隨他的時間不可考。要之，以吏爲師，無可置疑。漢書卷九十，酷吏傳謂：「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嚴延年在丞相府學法律，顯然是因爲父親的關係。吏之子在耳濡目染之餘，很容易走上爲吏的道路。張湯父爲長安丞。他從小習見父親治獄理案，也就學會了。據說有一次父出門，張湯看家。老鼠偷了肉，父親回來，大怒，打湯。張湯挖老鼠洞，尋得老鼠和剩下的肉。他「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幷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178)。嚴延年、張湯都受到父親影響，但都說不上是家學。家學將於下文，另例舉證。

從以上所能知道的事例看來，漢代的「以吏爲師」不全同於秦。秦有主法之吏，有學室弟子之制，有一定學法的進程與教本。換言之，秦的「以吏爲師」似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組織，只是我們所知道的極爲有限。漢代則不然。漢代雖然也以吏爲師，却不見特定的教法之吏，以及相關的制度或組織。或許因爲漢承秦代酷政之後，有意避免尙法的痕迹。也可能由於秦禁私學，法律訓練不能不由政府設官辦理。漢代無私學之禁，學律可從私人，故無設置專責機構的必要。不過，漢代學律，所從之私人有很多是俱有吏的身分的。

(2)　以律令爲家學

漢初地方似無學校，其後地方學校似亦不授律令。欲有學法令，往往須遠赴京師。武帝時，蜀郡太守文翁曾「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179)。又秦豐「邙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爲縣吏」(180)；王禁「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181)；東漢時，張浩「治律、春秋，游學京師」(182)，皆爲其例。他們如何學律？向誰學？惜無可考。西漢昭宣時，嚴延年

註178 漢書卷五十九，張湯傳。
註179 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
註180 東觀漢記卷二十三，頁9ab。
註181 漢書卷九十八，元后傳。
註182 三國志卷四十五，張翼傳裴注引益部耆舊傳。

因父爲丞相掾，「少學法律丞相府」(183)。這是習律地點可考的一個例子。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條屬官有孝經師、月令師和律令師，並云：「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宋書卷卅九，百官志「刺史」條謂：「孝經師一人，主試經；月令師一人，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一人，平律…漢制也。」這些「師」，除孝經師，於東漢州郡無可考(184)。律令師不論屬司隸，或普隸於州刺史之下，所職似並不在教授法令。東漢人赴京師習律令，應不是從律令師，而是從其它的途徑。

其他的途徑之一就是從學於私人。秦時學法令須以吏爲師，大概沒有私人授受律令的。漢初，韓安國「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185)；鼂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186)。鼂錯與宋孟、劉帶同師張恢，是私人有學。所學名爲申、商刑名，或亦有律令在內。後來鼂錯在文、景朝任官，於「法令多所更定」，又言「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187)。鼂錯這三十篇書，漢書藝文志列入法家，其實只是法令。漢代以後言申、商刑名者，可能逐漸以律令治獄之實務爲主，蓋時勢已異是先秦，不得不然。晉書刑法志引魏律序：「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此「刑名」義爲五刑罪例，已非先秦形（刑）名原義(188)。名同而實異，時勢之變，於此可見。

漢初已有私人傳習律令，唯似尚無家學。漢代律令形成家學，和經學的發展有類似之處。西漢私家傳經，因章句解釋相異而成門派，律令亦因解釋比附之不同而有了武帝時的大杜律和小杜律。大杜指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他和他兩個任郡

註183 漢書卷九十，酷吏傳。

註184 嚴耕望先生於郡縣學官云：「漢人極重孝經，故州有孝經師，郡職無考，然宋恩等題名碑有孝義掾，文學孝掾，蓋卽孝經師之類歟？」，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頁255。又王莽以後，於鄉，聚立庠序，置孝經師各一人，見漢書平帝紀。

註185 漢書卷五十二，韓安國傳。

註186 漢書卷四十九，鼂錯傳。陳直，漢書新證謂：「漢舊儀云『博士稱先生』，或簡稱爲先，如梅福傳之叔孫先、李尋傳之正先，本傳之鄧先是也。或簡稱爲生，如伏生、轅固生、賈生是也。此獨稱張恢生，在姓名下加以生字，尙屬創見。張恢亦疑爲秦代之博士，故史記稱爲張恢先」（頁293～294）。如陳直說可取，則可見漢初傳申、商刑名者的身分。

註187 同上，鼂錯傳。

註188 晉書卷三十刑法志。「形名」與「刑名」義，參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刑名」條，頁1a～b。

守的兒子「治皆酷暴」(189)。唯有三子杜延年，也就是小杜，「亦明法律」，「行寬厚」(190)。據說大將軍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191)。大、小杜治獄有寬嚴，蓋因比附律令不同，所謂「罪同而論異」，「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192)。這種比附不同的情形必因武帝時法令增加，典者不能徧睹而趨於嚴重。律令比附解釋不同，傳習亦呈分歧，遂有章句出現。大、小杜律可能已有章句(193)。杜周三子是否從父學律，不可考，然而私淑者或從大杜，或從小杜，竟演成律令之學的兩個派別。兩派律令傳習不絕。東漢時，習大杜律可考的有馮緄、苑鎮。馮緄碑云：「習父業，治春秋嚴、韓，詩倉氏，兼律大杜」(194)；苑鎮碑云：「韜律大杜，綜皋陶甫侯之遺風」(195)。傳小杜律者，則以潁川郭氏最爲著名。後漢書卷四十六，郭躬傳謂：「父弘，習小杜律」。同卷，陳寵傳說：「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三家之律唯大、小杜可考。又晉書刑法志云：「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是三家之律又可再分爲十餘家。家有章句，各數十萬言。漢代律令學派之盛，於此可見。

律令傳授分家立派雖始於西漢，但世世相承的家學多見於東京之世。西漢大、小杜的後人，仕宦頗盛：杜欽好經書，杜業以材能聞，未見以律令著名的(196)。東海于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亦爲獄吏，郡決曹」(197)，遷爲廷尉，御史大夫。于氏子孫也不見繼續學法。只有西漢末，王霸家「世好文法」(198)。王霸祖父爲詔獄丞，父爲郡決曹掾，霸少亦爲獄吏。這是西漢所見三代習法的例子。

註189 漢書卷六十，杜周傳。
註190 同上。
註191 同上。
註192 漢書卷二十三，刑法志。
註193 晉書刑法志謂：「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叔孫指叔孫宣，郭爲郭令卿，馬爲馬融，鄭氏爲鄭玄。杜疑即指大杜或小杜章句。然大、小杜章句非必成於杜周、杜延年本人。傳其學者，守師說而定章句也有可能。
註194 隸釋，卷七，「車騎將軍馮緄碑」，頁 13a。
註195 隸釋，卷十二，「荆州從事苑鎮碑」，頁6b。
註196 漢書卷六十，杜周傳。
註197 漢書卷七十一，于定國傳。
註198 後漢書卷二十，王霸傳。

東漢以後，以律令爲家學者，有郭、陳、吳、鍾四氏可考。潁川郭氏習法可考者自郭弘始。後漢書卷四十六，郭躬傳謂：

> 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
>
> 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
>
> 中子晊，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
>
> 弟子鎮。鎮字桓鍾，少修家業…延光中爲尚書…尚書令…拜河南尹，轉廷尉。〔鎮〕長子賀…累遷，復至廷尉。
>
> 鎮弟子禧，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
>
> 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又丹陽太守郭旻碑云郭旻治「律小杜」(199)。後漢書卷四十六，王先謙補注引惠棟曰：「旻字巨公，太尉禧之子，乃知郭氏世傳小杜律矣」。郭氏一家傳律令，從東漢初以迄靈帝，與東漢一朝幾相始終。郭氏子孫憑律令可位至公侯、二千石，可見律令與經學同爲獵取青紫的途徑。

沛國陳氏以律令爲家學，始於西漢末，王莽之世。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寵傳云：

>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簒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愼無與人重比」。
>
> 建武初，欽子躬爲廷尉左監，早卒。
>
> 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
>
> 寵子忠。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

註199 全後漢文，卷九十九，頁6ab。

陳咸爲尚書，辭官以後，將律令文書　藏於家中，這是律令能爲家學的重要條件。這些傳法之家，或傳子孫，或聚衆授徒，世世典帝國的法律。法律的刪修整理也往往出自他們的手中。例如陳寵、陳忠父子曾先後鉤校律令條法。寵曾「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鮑〕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200)。忠曾承父志，除漢法溢於甫刑者，「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201)。

河南吳氏世傳法律，始於順帝時的吳雄。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其子訢、孫恭，皆爲廷尉，「爲法名家」(202)。以上三家都是廷尉之家，世傳法律。唯一例外的是潁川鍾氏。後漢書卷六十二，鍾皓傳謂：

>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

鍾家世善刑律，惜其家世不可考(203)。鍾皓隱避不仕，以詩、律教授至千餘人。這一方面反映律令傳學之盛，不下於經學；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漢人兼習經、律的風氣。

(3)以兼習經、律爲風尚

漢儒不同於後世儒生的一個特色卽在兼重經、律，亦兼習經律。（南北朝時期間亦有兼習經律者，唯風氣之盛不及兩漢。詳後。）漢儒以爲法律造於皐陶(204)，而將皐陶與孔子並列，所謂：「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205)者是。皐陶代表公正、廉直。漢代故事，廷尉祀皐陶，繫獄者亦祭之(206)。漢人碑銘讚辭每見「膺皐陶之廉恕」，「綜皐陶之遺風」(207)等語，可見皐陶的地位。漢代律令之簡與經簡皆長二尺

註200 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寵傳，

註201 同上。

註202 同上。

註203 東觀漢記卷十三謂侯霸於王莽之世，「從鍾寧君受律於淮平大尹」。疑鍾寧君爲鍾皓先祖。唯無佐證，姑言之，待考。

註204 漢儒之說本於古籍。左傳昭公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竹書紀年：「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風俗通義引皐陶謨曰：「虞始造律」。史游急就篇採之，曰：「皐陶造獄，法律存也」（後漢書卷四十四，張敏傳李賢注引）。

註205 後漢書卷四十四，張敏傳。

註206 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傳：「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曰：『凡坐繫皆祭皐陶〔集解：惠棟曰：摯虞集記云：故事：祀皐陶于廷尉〕』，滂曰：『皐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晉書卷十九，禮志上：「故事：祀皐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

註207 見全後漢文卷一〇二，「博陵太守孔彪碑」，頁2a；卷一〇六，「荆州從事苑鎮碑」，頁4a。

四寸，此亦可見律與經等量的地位(208)。要之，漢人兼重經律而兼習。其著者，前有董仲舒，後有馬融、鄭玄。其餘士子小儒，不勝細數。

董仲舒爲一代儒者宗，又作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209)。以春秋決獄，兩漢例證甚多(210)。所謂春秋決獄，是以律令斷事，而以經義輕重之。論衡謂：「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211)。如此，非但須通經義，亦必明於律令。漢書循吏傳謂：

>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

「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一語，將經術與律令之用，表露無遺。知律令而不知經術，則爲刀筆俗吏；知經術而不知律令，則爲不通世務的俗儒。兩者皆爲漢人所不

註208 關於漢代律令簡長問題，王先謙曾在漢書卷六十，杜周傳的補注中有詳細的討論。他相信漢代所說的三尺法，卽以漢尺三尺之簡書律令，非如沈欽韓所說，以漢之二尺四寸當周之三尺。他所依據的只有漢書的杜周與朱博兩傳，而未能解釋其它文獻中二尺四寸律簡的記載。鹽鐵論詔聖篇謂：「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後漢書卷三十五，曹褒傳謂曹褒修訂叔孫通漢儀，「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此蓋兩段律令簡長二尺四寸的明確記載。漢代儒經亦書以二尺四寸簡。論衡卷十二，謝短篇：「二尺四寸，聖人文語。」又卷二十八，正說篇：「夫論語者，弟子共記孔子之言行……以八寸爲尺記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王充言下之意，一般經書蓋二尺四寸也。如此，兩漢經、律簡應同長。

若從實物證之，武威所出儀禮簡，其甲、丙本經簡長皆近漢尺二尺四寸，乙本爲經傳，稍短，爲二尺一寸半，是論衡量知篇所謂「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之制。參武威漢簡，「敍論」，頁55～56。陳夢家在寫武威漢簡「敍論」時，原主二尺四寸之說，可是到一九六三年，寫「西漢施行詔書目錄」時，放棄原說，又主「三尺律令爲漢制，先漢亦當如此。」（漢簡綴述，頁 275）。其證據是長六十七點五厘米，居延地灣出土的詔書目錄札。按：詔書簡策長度在漢有定制。蔡邕獨斷載詔書之策「長二尺，短者半之。」武威磨咀子十八號墓所出王杖十簡，爲制詔丞相、御史的詔書，簡長恰爲漢尺一尺（參武威漢簡，頁 141）。但此十簡中一簡明書「蘭臺令第卅三，御史令第卌三」，是律令簡長亦僅一尺！青海大通上孫家寨有關軍事的律令木簡，長二十五厘米，稍多於漢尺一尺。（「青海大通上孫家寨一一五號漢墓」，文物 2（1981），頁18）居延新出「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簡長約二十三厘米，約合漢尺一尺（初仕賓，「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考古 2（1980），頁179～184）；同地所出之「塞上蓬火品約」簡則長三十八點五厘米，合漢尺一尺六寸餘（「塞上蓬火品約釋文」，考古 4（1979），頁360～364）。這些不等的律令簡長應如何解釋？它們是因邊地材料限制，而出現的變制？或者還可作其它解釋？這有待居延新出成帝、王莽等時期的「詔書輯錄」簡冊資料發表，我們才可能有較爲肯定的答案。

註209 此據漢書卷三十，藝文志。

註220 程樹德，「春秋決獄考」，舉證甚備，可參。見氏著，九朝律考，頁163～177。

註211 論衡，卷十二，程材，頁5a。

取(212)。

自董仲舒以後，馬融、鄭玄等大儒有律令章句之作。晉書刑法志說：

> 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

除了刑法志提到的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漢儒作律章句可考的還有應劭。後漢書卷四十八，應劭傳說應劭「撰具律本章句」。章句在於顯明家法，對抗異說(213)。有家法章句則有傳習，是馬融、鄭玄諸儒於傳經之餘或亦傳律令矣。前引鍾皓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鄭玄注周禮、禮記每引漢律以明經義(214)，皆可爲漢儒兼授經、律之證。

有兼授則有兼習者。兩漢兼習經、律者，不可勝數，略舉若干如下：

1. 公孫弘「少時爲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漢書卷五十八，本傳）
2. 何敞「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鼂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後漢書卷四十三，何敞傳）

   李賢注引何氏家傳：「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
3. 丙吉「治律令，爲魯獄史」，「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漢書卷七十四，本傳）
4. 于定國「少學法于父…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漢書卷七十一，本傳）
5. 黃霸「少學律令，喜爲吏」，「繫獄當死，霸因從〔夏侯〕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乃出」。（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

註212 漢人斥俗吏但知刀筆律令，不識大體，始於賈誼。其後同調者甚多，參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卷五十，汲黯傳；卷七十二，王吉傳；論衡卷十二，程材、量知、謝短諸篇。斥純任德教爲不達時宜之俗儒，見本文前引宣帝語，出漢書宣帝紀。又王褒，「儒吏論」以「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全後漢文卷九十一，頁40）爲理想，此亦漢儒之理想也。

註213 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見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頁201～214。

註214 薛允升，漢律輯存輯鄭玄以律解經者，禮記注一例，周禮注四十一例，見是書頁64～84。

6.谷永薦薛宣曰：「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漢書卷八十三，薛宣傳）

7.翟方進「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西至京師受經…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爲通明相」。（漢書卷八十四，本傳）

8.路溫舒「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又受春秋，通大義」。（漢書卷五十一，本傳）

9.張敞「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漢書卷七十六，本傳）

10.鄭弘「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漢書卷六十六，鄭弘傳）

11.孔光「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漢書卷八十一，本傳）

12.侯霸「從鍾寧君受律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東觀漢記，卷十三）「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後漢書卷二十六，本傳）

13.張浩「治律，春秋，游學京師」。（三國志卷四十五，張翼傳裴注引益部耆舊傳）

14.王渙「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傳）

15.黃昌「會稽餘姚人也…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後漢書卷七十七，酷吏傳）

16.陳球「少涉儒學，善律令」。（後漢書卷五十六，本傳）

17.陳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爲任職相」。（後漢書卷四十六，本傳）

18.郭禧「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後漢書卷四十六，郭躬傳）

19.馮緄「習父業，治春秋嚴、韓，詩倉氏，兼律大杜」。（車騎將軍馮緄碑）

20.董昆「少遊學，師事潁川荀季卿，受春秋，治律令，明達法理，又才能撥煩。縣長潘松署功曹史。刺史盧孟行部，垂念寃結。松以孟明察於法令，轉署昆爲獄史。孟到，昆斷正刑法。甚得其平。孟問昆：『本學律令？所師爲誰？』昆對：『事荀季卿』。孟曰：『史與刺史同師』。孟又問昆：『從何職爲獄史？』松具以實對。孟歎曰：『刺史學律，猶不及昆』，召之署文學」。（太平御覽六三八引會稽典錄）

以上第⑳例，董昆與盧孟同事荀季卿爲師。荀季卿兼授律令與春秋，董、盧亦兼習之，可爲漢儒經、律兼授兼習的最佳例證。盧孟因董昆明律，召署文學，似乎意味漢代文學一職非必明經者任之(215)。又續漢書卷二，北海靜王興遷宏農太守，「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寃獄。」以文學理寃獄，是文學亦通律令。可惜對此，我們沒有資料可作進一步的討論。又律令是爲吏的基本知識，僅爲小吏，知律令卽足。如欲更上層樓，服膺青紫，則更須經術文雅。公孫弘、丙吉、于定國、黃霸、翟方進、路溫舒皆先習律令爲吏，而後學經。習經、律之次第於此可見。然亦有先經學而後律令者，如孔光。急就篇謂：「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216)。此處爲配合韻脚，不足以見學經、律之次第。然用以證宦學須經、律兼習，則甚顯然。第⑮黃昌例亦有可言之者。黃昌居近學官，「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是黃昌於學官兼受經學與文法歟？兩漢郡國學官有經師，但不見有授律令之例(217)。如果前考漢儒兼授經、律可信，則學官經師或亦可能如此。此事無確證，姑言之，以待考。

總結而言，由於律令與經義是漢代政治運作的兩大依據，張敏謂：「法聖人，從經、律」(218)，孔光「據經、法」對上所問(219)，律令學與經學遂同盛於兩漢。學律令主要是以吏爲師。以律令爲家學者，幾全在朝爲官。其門徒數百或上千，實亦以吏爲師

註215 陳夢家在「武威漢簡補述」（漢簡綴述，頁286～290）中曾對漢代文學及文學弟子有所考述。他說：「漢代所謂『文學』，乃指經學而言。它同時又是一種資歷和學官的稱謂。」（頁 286）文學乃指經學一語，不完全正確。例如，文帝時，鼂錯習申商刑名，「以文學爲太常掌故」（史記，鼂錯傳），此文學絕非經學。又武帝好文學，所好實指賦頌辭章，亦非經學。武帝以後，文學多指經學則是不錯的。

註216 王應麟校急就篇第二十五、二十六章，頁8b。

註217 參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頁252～256。

註218 後漢書卷四十四，張敏傳。

註219 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

也。律令家學，說各有異，竟產生出十餘家，數百萬言的律令章句。這又是兩漢經師，因兼治經、律，以治經之法治律的結果。可惜各家律說不傳，程樹德所輯亦不過八條(220)。否則，統一的律令如何能允許十餘家不同的章句解釋，倒是值得進一步追究。

肆、律令學的沒落與曹魏以降律博士的出現

律博士初置，是在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A. D. 216），曹操稱魏王以後。宋書，百官志謂：「廷尉律博士，一人；魏武初建，魏國置。」據此，律博士原置於魏國。漢末，權在曹氏。律博士雖初現於漢末，實際上可以說是曹魏的制度。魏明帝立，因衞覬的建議，王國制下的律博士，又一變而爲隸屬中央廷尉的職官。自曹魏初創，後代相沿。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隋、唐和宋代，都曾設置律博士(221)。律博士爲何至曹魏而出現？其意義何在？此事不但關係一代政治，亦足以覘時代學風的轉變。魏國的律博士如何，沒有進一步的資料。我們可從衞覬的奏議說起。

三國志卷二十一，衞覬傳云：

> 明帝卽位，〔覬〕進封閿鄉侯，三百戶。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敎授。」事遂施行。

晉書刑法志也提到衞覬的奏議，內容相同而更簡略。三國志所述遂爲魏立律博士最重要的資料。這一段資料已透露出律博士設立的背景。第一，律令長久以來是治民的依據，治民之吏不能不通律，所謂「百里長吏，皆宜知律」。衞覬提出這一點，是不是意味當時的官吏已不明律令？第二，他說：「刑法者，國家所重，而爲私議所輕」。本文前論以爲漢儒兼重經、律，是風氣至曹魏而有變乎？第三，他說百姓懸命於獄吏，獄吏卻爲選用者之所卑下。兩漢吏治，首重治獄，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222)。漢代治獄吏擢登公卿者甚衆，是人材選用亦至曹魏而變乎？要了解律博士設立的背景，對這些問題都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討論。

註220 見程樹德，九朝律考，卷八，頁18。

註221 徐道鄰，「中國唐宋時代與法律教育」，頁30～32。

註222 漢書卷五十一，路溫舒傳。

首先，世事之變，每在積漸，不在一時。曹魏建立（220 A.D.）到明帝卽位（227A.D.），不過短短七載。衞覬所說的情形絕非到曹魏以後才出現。曹丕父子明察好法，固可解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然兩漢天子亦重法，非曹氏獨然。選用卑下獄吏，私議輕賤刑法，其端倪實已見於東漢，歷兩百年而卒成其變。

前文所說兩漢重律，選材用人每因明曉律令，是就其大勢而言，也是以與後世比較而說。若細繹之，則東京以後，漸有變化。東漢以後，經、律漸分，經學本身雖漸漸僵化貧乏，仍爲士人所標榜，律學却漸爲士人所輕。這種變化是逐漸的，痕迹也不明顯。東漢末葉雖然仍有鄭玄、應劭兼治經、律，但這似乎已不是主流。東漢政治勢力的主流是一羣標榜經學，重身份而以實務爲次的豪門世族。他們憑藉門第身分，託名經學，假言德性，漸不屑於實務。後漢書陳寵傳說陳寵於建武時辟司徒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尙交遊，以不肯視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尙交遊，不肯視事的風氣和章帝時韋彪所說選士不以才行，「純以閥閱」(223)，以及和帝時，王符所說俗士之論，「以族舉德，以位命賢」(224)的風氣是相爲表裏的。晉初傅玄批評漢、魏「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225)。他批評「漢魏」的「漢」，實指東漢而言。東漢貴游子弟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一般以律令實務見長的吏反而沉淪下僚。這可從東漢孝廉的出身見之。孝廉是東漢士人由吏而官的要途。但是東漢可考的孝廉自地方長吏超拔的，只有和帝至順帝時，稍過一半，其餘絕大部分時期，都不及三分之一(226)。官職既由世族盤據，官、吏遂分途，經、律亦兩判。世族不尙律令實務，律令之學遂衰。當然律令學衰微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例如東漢律令日趨龐雜，足以造成學習的阻碍等等，但是律令實務漸失世族的支持，似爲其中主要的原因。律令學衰，龐雜的律令不能不有人整理，不得不有人專司教授，以培養治民不可少的明法之吏，於是有律博士的設立。

東漢經、律漸分和重經卑律風氣變化的痕跡十分隱微。大致而言，光武、明帝之

註223 後漢書卷二十六，韋彪傳。

註224 潛夫論卷一，論榮第四，頁10b。

註225 晉書卷四十七，傅玄傳。

註226 參拙著，「東漢孝廉的身分背景」，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頁19，表二，「屬吏出身孝廉比例表」。

世，似尚重律令。活在光武、明、章之世的王充曾感慨儒生的際遇不如文吏。他說：「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227)。又說：

> 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228)。

約略和王充同時的韋彪也有類似的觀感。後漢書卷二十六，韋彪傳說：

> 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

風氣的轉變大約在東漢中期。。和帝時，樊準上言：

> 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趙〕孝、〔承〕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頃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229)。

他顯然認爲郡國書佐小吏應習律令，而舊儒子孫則守經學。所謂舊儒子孫卽世族子弟。換言之，他不再認爲儒經與律令爲官吏一體同守，而是各有所習。順帝時，左雄言孝廉選舉，主張「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230)。至此，經學與律令分別已更爲清楚。因儒生與文吏所習不同，課試遂亦有別。漢末，世家大族更明白卑視律令。靈帝時，拜楊賜爲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固辭，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注：吝，恥也〕」(231)。弘農楊氏世傳經

註227 論衡，卷十二，程材，頁3b。

註228 同上，頁5ab。

註229 後漢書卷三十二，樊準傳。

註230 後漢書卷六十一，左雄傳。

註231 後漢書卷五十四，楊賜傳。

學，恥爲廷尉，於此可見世族對律令實務的態度。不唯此也，皇帝本人竟也以儒法雜揉爲非。靈帝中平五年九月己未詔：

> 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揉，學道浸微。處士荀爽、陳紀、鄭玄、韓融、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爲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232)。

兩漢治道本在兼雜王、霸。靈帝竟斥責選舉儒法雜揉。漢末風氣的轉變，此又一徵驗。可是漢末經學空洞而不務實，也曾激起不少學者的反動。例如崔寔、仲長統、應劭等人有鑑於經學空言，無補亂世，主張改以嚴刑重罰。崔寔說：「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233)。仲長統則明言「定五刑以救死亡」(234)。曹操與曹丕父子尙法務實，多多少少是承續這一派的反動而來。但是經學世族卑視律令刑名終是不可挽回的大勢。和衞覬同時代的王粲曾作儒吏論，反映這種大勢甚爲清楚：

> 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則文法典藝，具存于此矣。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搢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235)。

王粲所說的末世，其實就是漢末。所謂「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搢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乃是兩漢以來「吏服雅訓，儒通文法」傳統的最大轉變。

「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是漢代官吏品質的一大特色。可是這並不始於漢初。漢初君臣，承秦遺風，唯知刀筆，無所謂雅訓可言。賈誼說：「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236)。「陛下又不自憂」一句點破漢初君主所知，與俗吏無異。唯自武帝尙儒，以儒術緣飾法律，以古義附會律令，史謂「〔張〕湯由是鄉學」(237)，此吏服雅訓之始也。此後，君臣議政，多引經據律，治

註232 後漢紀卷二十五。
註233 後漢書，卷五十二，崔寔傳。
註234 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傳。
註235 全後漢文卷九十一，頁4a。
註236 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
註237 漢書卷五十八，兒寬傳。

獄亦輒衡以春秋，遂促成漢代兼習經、律的風氣。這種風氣經數百年而後變。順帝時，儒生與文吏課試已不相同。魏文帝黃初三年詔：「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238)。課試不同反映兼習的風氣發生變化。這個變化到曹魏時完全明朗，因而王粲對「吏服雅訓，儒通文法」的傳統竟只能心嚮往之了。

曹魏設立律博士的意義不同於漢武帝置五經博士。五經博士的設置象徵儒學的興起，而律博士的設立則在挽救律令學的沒落，是律令學衰微的標示。曹魏以降，雖仍有言法之士，律令家學亦見記載(239)，然而律令刀筆毫無疑問逐漸淪爲寒門所職，已非高門貴族所屑爲。晉葛洪曾指出：「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240)。他所說不知法令的官長大約都是因父兄得任的貴游子弟，而知法者多出身寒素。東晉初，熊遠上疏便說：「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241)在魏晉以後一個日益貴族化的社會裏，律令學得不到貴族的支持，便只有沒落一途。南齊崔祖思曾感慨地說：

> 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袞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242)。

南齊孔稚珪也指出「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他建議「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243)。從魏、晉至隋代，律博士始終是廷尉（晉、宋、齊、梁、陳、北魏）或大理寺（北齊、隋）的屬官，不得預國學學官之列。孔稚珪亦僅建議於國學置律助教，而非律博士，然「事竟不施行」。北朝情形稍異。北朝

註238 三國志卷二，文帝紀。

註239 程樹德，九朝律考，卷九，頁37～38；卷十一，頁26。

註240 抱朴子外篇，卷十五，「審舉」；卷三十四，「吳失」。又參，趙翼，廿二史箚記，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條，頁171～172；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卷三，勉學第八。

註241 晉書卷七十一，熊遠傳。

註242 南齊書卷二十八，崔祖思傳。

註243 南齊書卷四十八，孔稚珪傳。

世族保守兩漢舊風較多。他們在胡人政權下，不能不以實學討生活。例如崔浩卽「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244)，神䴥中參與改定律令(245)。律令家學亦不絕如縷，其中足以稱述者，則唯北齊封氏。渤海封氏歷世明法，可考者有封隆之、封繪、封述(246)。他們參與律令修訂。南北朝律，以北齊律最優，此與律令家學一息尙存不無關係(247)。封氏之後，卽不見再有以律令名家者。律令家學旣衰，雖有律博士之置，但律生出於寒門，高族不屑於刀筆，漢代律令學的盛況遂一去而不復返。

伍、結　　語

從先秦到秦漢，中國出現了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的官僚組織。這個組織相沿兩千年，其影響中國社會的深遠廣大，論者已多；它如何組成，如何演變，也不乏論述。但是它到底依循什麼而運作？組織中的官吏憑藉什麼處理例行的事務？這一類問題似乎還值得討論。據前文所述，從春秋戰國以來，隨著集權官僚組織逐漸形成，就已經有一套龐雜的「法」。法的來源是君主，所謂法出於君。君王的法令經由層層分責的官僚，下達於編戶齊民。這構成戰國政制的特色。秦漢政制沿續戰國的規模，依法而治的原則也相沿未改。依秦漢的習慣，這些號令法規可統稱爲律令。依律令而治，則官吏須先明律令。

大致來說，秦漢官吏習律令，基本上是依循「以吏爲師」的形式。根據商君書和雲夢秦簡看來，秦代有專主法令傳授的官吏，也有專供吏的子弟學習的學室。這些學習者在當時或稱爲弟子。弟子享有某些除復徭役的特權，也有免於被過度役使的保障。他們學習有一定的進程和教本。習不中程會受處罰。所學大約以政府的法令規程爲主。以雲夢秦墓的主人爲例，他不過是地方治獄的小吏，墓中出現的律目最少就有三十多種。這些他熟知習用的法律，內容相當廣泛。不過，大部分和處罰或治獄的事有關係。秦、漢吏治重在治獄，雲夢秦簡可以說作了最適切的證明。

漢代的官吏像秦代的一樣，大部分是所謂奉律令以從事的刀筆吏。雖然漢初以

註244 魏書卷卅五，崔浩傳。

註245 魏書卷四上，世祖紀。又參王伊同，「魏書崔浩傳箋註」，頁698。

註246 北齊書卷二十一，封隆之傳；卷四十三，封述傳。

註247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見陳寅恪先生論集，頁67～76。

來，君臣上下或崇黃、老，或尚儒術，他們幾無不承認律令刑法是治民的必要工具。漢代政府選才用人，在大部分情況下，也都以通曉律令爲重要甚至必要的條件。因此，習律爲吏在漢代應該是很普遍的情形。一般人從閭里書師或其他途徑學書識字以後，卽可試爲小吏。在倉頡、急就等識字的教本中已包括有初步的律令知識。但這是不够的。小吏大概一邊任事，一邊還要見習。見習所學最重要的就是法令規章。漢代基層的刀筆吏多半是這樣訓練出來的。秦、漢人學法令雖然都是以吏爲師，但有一點不同：漢代似乎沒有設置專授律令的官吏，最少我們找不到這樣的證據。

漢與秦制另一不同是漢代不禁私學，欲習律令，可從私人，非必以吏爲師。漢初傳習申、商刑名的多爲私人。他們傳習雖名爲申、商，實則多與治獄律令有關。這從鼂錯等人所習所爲卽可窺見。西漢中晚期以後，由於法令日益龐雜，解釋比附不一，私人傳習不同，竟然造成章句家學。律令章句初或有三家，可考者唯武帝時的大、小杜律；東漢時演爲十餘家，家各章句數十萬言。這種情形絕不是秦代禁私學的情況下所能有。漢代律令形成章句家學的另一個原因是武帝以後，士人兼習經、律；經師以治經之法以治律。經有章句，治律遂亦如法泡製。

漢儒兼習經、律實爲漢代學風有異於秦，亦不同於後代的一大特色。秦人唯知律令，不習經；後世儒者一般而言則只守經而不習律。董仲舒通經明律，開一代學風之典型；馬融、鄭玄承其後，各有律令章句之作。造成這種學風的關鍵似在漢儒重經而不輕律以及漢代學術與政治的緊密結合。漢代政治依經據律，學而優則仕的儒生就得兼明二者。不過，律令畢竟是基本。漢吏功令但問是否「頗知律令」，不察是否通明經術。只有在仕途上想要更上層樓，經學知識才是不可少的。因此，漢代公卿每多習律在先，明經於後者。當然也有經生先通經而後習律。何種情況較多，已不易細究。總之，從秦以來，習律令已成風氣；漢初以後，私家傳授又甚普遍。漢代或竟因而不覺有設專人傳授律令的必要。此外，漢人雖然兼重經、律，但是根據漢儒的政治哲學，儒經代表德治，爲主；律令代表刑法，爲輔。五經爲主，可立博士；律令不過爲輔，豈可與爲主之五經等列？漢儒德主刑輔的思想頗減少了律令博士在漢代出現的可能。曹魏以後則不然。曹丕父子出身「法家寒族」，他們非德尚法，不同於「儒家大族」(248)。從漢末至曹魏時代的士人，也感於流於空洞虛僞的儒家德教，不足以應付

註248 此處借用陳寅恪先生語。見氏著，「崔浩與寇謙之」，陳寅恪先生論文集，頁587～589。

混亂的世局。德主刑輔的思想不再那麼有說服力，律令之學遂可由婢女而爲夫人。

然而曹魏律博士的出現似更植根於兩漢以來「吏服雅訓，儒通文法」傳統的轉變。漢代士人自武帝以後兼習經、律，不但明聖人之言，也通刀筆實務，循吏傳中人物多爲典型。東漢以降，豪門世族勢力膨脹，政治貴族化，仕宦漸重身分而輕實務。實務所寄之律令，高門世族不屑一爲。經與律學遂漸分，儒生與文吏亦成兩橛。這種分化的發展，甚爲緩慢，痕跡亦甚細微。抱經傳律的世族雖綿延至南北朝而不斷，但律令確實逐漸淪爲寒門的技藝。作爲政治勢力主流的世家大族既不屑於刀筆，律令學只有沒落一途。曹魏以降律博士的設立，不過是律令學在沒落中的掙扎罷了。

附記：本稿曾蒙陳槃庵先生，嚴歸田先生以及同儕好友杜正勝、陳鴻森、張榮芳、黃進興、劉增貴、劉淑芬諸君熱心指正，謹此誌謝。又本文寫作期間曾獲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獎助，一併誌謝。

引　用　書　目

1. 司馬遷，史記（宏業書局，史記會注考證）
2. 班固，漢書（藝文印書館，補注本）
3. 范曄，後漢書（藝文印書館，集解本）
4. 陳壽，三國志（藝文印書館，集解本）
5. 袁宏，後漢記（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
6. 東觀漢記（中文出版社）
7. 漢官六種（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8. 國語（里仁書局，校注本）
9. 春秋左傳正義（大化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10. 禮記正義（大化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11. 尚書正義（大化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12. 周禮注疏（大化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13.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廣文書局）
14. 安井衡，左傳輯釋（廣文書局）
15. 屈萬里，尚書釋義（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57年）
16. 朱熹，四書集註（世界書局）

17. 逸周書（重編本皇清經解，朱右曾集訓校釋）
18. 韓非子（世界書局，王先愼集解）
19. 呂氏春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20. 商君書（中華書局，高亨注譯）
21. 管子（東豐書店，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集校）
22. 管子（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
23. 荀子（新興書局，謝墉集解）
24. 淮南子（世界書局，高誘注本）
25. 賈誼，新書（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26. 董仲舒，春秋繁露（河洛圖書出版社，蘇輿義證）
27. 韓嬰，韓詩外傳（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28. 戴德，大戴禮記（武英殿聚珍版）
29. 桓寬，塩鐵論（世界書局，王利器校注）
30. 應劭，風俗通義（明文書局，王利器校注）
31. 劉向，新序（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32. 王充，論衡（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33. 王符，潛夫論（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34. 楊雄，法言（世界書局，汪榮寶義疏）
35. 蔡邕，獨斷（抱經堂校定本）
36. 班固，白虎通德論（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37. 顏之推，顏氏家訓（明文書局，王利器集解）
38. 葛洪，抱朴子（世界書局，孫星衍校本）
39. 竹書紀年（華世出版社，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
40. 許愼，說文解字（藝文印書館，段玉裁注）
41. 急就篇（玉海附刻本，王應麟校）
42. 魏收，魏書（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
43. 房玄齡，晉書（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
44. 蕭子顯，南齊書（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
45. 李百藥，北齊書（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
46. 洪适，隸釋（藝文印書館，石刻史料叢書甲編）
47. 嚴可均，全後漢文（中文出版社，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48. 長孫無忌，唐律疏義（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

49. 太平御覽（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

50 趙翼，廿二史箚記（華世出版社）

51.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本）

52. 章學誠，文史通義（華世出版社）

53. 薛允升，漢律輯存（鼎文書局，中國法制史料第二輯第一冊）

54. 沈寄簃，漢律摭遺（鼎文書局，中國法制史料第二輯第一冊）

55. 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開明書店，廿五史補編）

56. 顧櫰三，補後漢書藝文志（開明書序，廿五史補編）

57. 程樹德，九朝律考（商務印書館，民國16年）

58.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增訂初版）

59.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民國60年自印本）

60.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45，民國63年）

61. 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本上冊，民國40年，頁89～143。

62. 勞榦，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40，民國49年）

63. 勞榦，「史記項羽本紀中學書和學劍的解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本下冊，民國48年，頁499～510。

64. 王伊同，「魏書崔浩傳箋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民國63年，頁681～727。

65. 陳槃，「古讖緯書錄解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2本，民國39年，頁85～120。

66. 陳槃，「春秋時代的教育」，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民國63年，頁731～812。

67. 陳槃，「於歷史與民俗之間看所謂壓錢與地券」，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中冊，民國70年，頁855～905。

68. 陳槃，漢晉遺簡識小七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63，民國64年）

69.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刊之3，陳寅恪先生論集，民國60年），又陳寅恪先生論文集（三人行出版社，民國63年）

70. 徐道鄰，「中國唐宋時代的法律教育」，東方雜誌，復刊6卷4期，民國61年，頁29～32。

71. 陳夢家，卜辭綜述（翻印本）

72. 陳直，史記新證（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69年影印本）

73. 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74. 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66年三版）

75. 邢義田，「雲夢秦簡簡介——附：對『爲吏之道』及墓主喜職務性質的臆測」，食貨9卷4期，民國68年，頁33～39。

76. 邢義田，「東漢孝廉的身分背景」，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2年，頁1～56。

77. *Kwang-chih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Yale U. P., 1980)

78. *H. G. Creel*, "The Fa-Chia: Legalists or Administrators" 慶祝董仲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民國50年，頁607～636。

79. *Kung-chuan Hsiao*, "Legalism and Autocracy in Traditional China" 清華學報 4卷2期，民國53年，頁108～122。

80.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

8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編，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

82.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第一期，一九七八，頁1～11。

83. 初仕賓，「居延簡冊≪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考古第二期，一九八〇，頁179～184。

84. 寶鷄市博物館，「寶鷄市鏟車廠漢墓——兼談M1出土的行楷體朱書陶瓶」，文物第三期，一九八一，頁46～52。

85. 王光永，「寶鷄市漢墓發現光和與永元年間朱書陶器」，文物第三期，一九八一，頁53～55。

86. 吳榮增，「鎮墓文中所見到的東漢道巫關係」，文物第三期，一九八一，頁56～63。

87. 河南省博物館，「靈寶張灣漢墓」，文物第十一期，一九七五，頁75～93。

88.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釋文」，文物第十期，一九七四，頁30～42。

89. 甘肅居延考古隊簡冊整理小組，「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責寇恩事釋文」，文物第一期，一九七八，頁30～31。

90. 于豪亮，「雲夢秦簡所見職官述略」，文史第八輯，一九八〇，頁5～25。

91. 胡平生、韓自强，「蒼頡篇的初步研究」，文物第二期，一九八三，頁35～40。

92. 傅舉有，「關于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墓主問題」，考古第二期，一九八三，頁165～172。

93. 凌襄，「試論馬王堆漢墓帛書≪伊尹・九主≫」，文物第十一期，一九七四，頁21～27。

34. 高亨，文史述林（中華書局，1980）。

95. 富谷至，「史書考」，西北大學學報第一期，一九八三，頁45～50。

96. 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蒼頡篇」，文物第二期，一九八三，頁24～34。

97. 沈元，「急就篇研究」，歷史研究第三期，一九六二，頁61～87。

98. 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